

目 录

前 言

东胜地域隶属及近代建制沿革概述

..... 吴尚书、奇纯一 (1)

民国以来东胜县县政建制概况

..... 李廷辅 (17)

东胜县参议会始末

..... 李先唐 (34)

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和三青团干事会的组
建及其活动

..... 李廷辅、刘继祖 (43)

东胜地区军事情况

..... 李廷辅、李先唐 (49)

东胜地区的匪患.....

..... 李廷辅、李先唐 (59)

解放前的东胜县教育

.....边媚山 (66)

东胜地区民间文化活动

.....王文光、刘继祖 (78)

东胜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边媚山 (88)

东胜县工商业概况

.....李先唐 (92)

苛捐杂税与徭役

.....李廷辅、李先唐、李飞雄 (102)

东胜地区早期农业生产

与风俗民情.....刘继祖 (109)

民族关系与宗教信仰

.....李飞雄、
李廷辅、李先唐、杨霖山、王怀礼 (122)

片断忆事

.....李廷辅 (129)

国民党保安十六团的始末

.....李静泉 (141)

绥远建设厅长冯曦氏建筑东胜县城记 (166)

录自：民国《边疆调整报告书之三》

责任编辑：程权胜、郝士伟、田永祥

东胜地域隶属及近代建制沿革概述

吴尚书 奇纯一

为了解东胜县地域隶属及近代建制沿革的历史，我们查阅了《绥远通志》、《内蒙古疆域考略》、《河套图志》以及民国《边疆调查报告书》等史书资料，现就东胜县地域隶属及建制沿革情况分期加以叙述，以供参考。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年—前221年）

春秋时期，河套地区（河南地）主要居住着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游牧于套内广阔肥沃的高原草场上。历史上称河套地区与今指河套地区的范围不同，古称则大，今称则小。《河套图志》称：“河以套名，主形胜也”，“譬河以绳，所套之地是也。”因此，河套地区主要是指今伊盟全境，陕北六县和宁夏的少部

分地区。战国七雄爭霸，赵武灵王北伐林胡、楼烦等民族，靠大青山（阴山）修筑长城，在套内分郡设县，置九原、云中等数郡，开疆拓土，耕牧其间。今东胜县境战国时归赵国所有。

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战国末年，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匈奴不断南侵，威胁秦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始皇32年派遣大将蒙恬统兵三十万出击匈奴，驱走胡人，收复河南地（河套），移民充边，建城数十座，号新秦中，今东胜县境正在其中。有始皇“驰道”作证。秦时为加强关中与河套的联系于始皇35年—39年（公元前212年—前208年）从云阴（陕西淳县）至九原（包头西）修了一条驰道，约一千四百余里纵贯河套。近年考古工作者已在东胜县漫赖乡发现秦“驰道”遗迹。

秦王朝兴骤溃速，统治时期甚短。不久，楚汉相争，其所略河南地（河套）又为匈奴夺回。今东胜县境复归匈奴占据。

汉初，河套一带仍为匈奴所占。汉武帝（刘彻）时，经汉初长期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国家鼎盛。汉武帝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遣派大将军卫青、李息等北征匈奴，历时十五年，匈奴大败。汉收复河南地（河套），并设五原郡、朔方郡、西河郡等五郡二十二县，移民十万口，设官屯田。今东胜县境为西河郡辖地。《绥远通志》称今东胜县境为汉时河套五郡之交界处。（指五原郡、朔方郡、云中郡、上郡、西河郡）。民国《边疆调查报告书》称今东胜县为汉初上郡（榆林）之白土县辖地（治所在今乌审旗地）。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连年不断，汉王朝渐衰，塞外郡县多废。南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强

盛起来，将河南故地（河套）逐渐占据。今东胜县境为南匈奴刘氏辖地（解放后在东胜县南境出土过南匈奴时的铜鹿，铜壶可以为证。）

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里，只有曹魏西晋还能分州列郡，依秦汉疆域而治之。至晋永嘉（晋怀帝司马炽年号）以后，我国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北方各族政权更迭不断，草原各少数民族移居黄河流域，跨长城的各州多为少数民族分据。

这个时代先后占据河套（河南地）的有前赵、后赵（羯族石虎据伊盟境）、前秦、后秦。公元405年，赫连勃勃（匈奴族）建都统万（今鄂旗境内），自称夏国，占据伊盟。夏后被北魏拓跋氏灭。北魏改统万为镇，又改置东西夏州。《绥远通志》载今东胜县境为东

夏州故地。公元557年，北周成立，其疆域包括今巴、伊两盟，今东胜县境辖归北周，直到隋统一南北为止。

隋唐五代(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杨广(炀帝)继立，改州为郡。在今伊盟东北境置榆林郡(准旗十二连城)，初称胜州，兼领河东西地，今东胜县境在其西南部。隋末农民大起义，逐渐形成群雄割据，梁师都称帝在朔方(杭锦旗、杭锦后旗)占领伊盟境。

唐太宗李世民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公元624年)。李唐王朝鉴于隋末州郡林立，官多民少的弊病，大加省并，革新政体，将全国分为十道二百九十三州。今东胜县境属唐王朝关内道胜州(准旗十二连城)辖地。天宝年间，在胜州西南四百里设麟州，置振武节度使。今东胜县境属麟州仍隶属于唐关内道。

唐亡梁兴，继以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时期。五代统治都未及今东胜县境。其时，拓跋思恭为首的西北党项族（夏）逐渐强盛起来，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与中原抗衡，伊盟境从唐末便被夏所占，约公元250年—公元300年。

宋、辽、金、夏时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宋初，宋统治者致力于统一中原，威德不及边疆。而北方契丹（辽），女真（金），党项（西夏）及蒙古汗国陆续兴起，先后称帝建国，中原的宋王朝形成了宋辽、宋金、宋元相继对抗的局面。

契丹（辽）在五代之末就占有中国北方，紧和宋朝接壤。辽曾置东胜州（今托县城），但其辖地是否达今东胜县境，书载不一。

女真族，祖籍今东北长白山一带。首领阿

骨打时，不堪于辽帝的统治，举兵攻辽，国势日强，称帝，国号金。辽败于金（公元1125年）。金占辽故地，曾将辽东胜州改为东胜县（为州治），这里所说的“东胜”是指今托县一带。但其辖境是否达今东胜县境，书载也不一。《内蒙古疆域考略》称：金“并出天山（大青山），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视辽之规模更为宏也”。根据这一说法，今东胜县境先为辽地，后为金辖地。

乘宋、辽、金大战之机，内蒙西南部还有唐末拓跋思恭子孙（党项族）的西夏，势力仍强，并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都兴庆（宁夏）。（史载：西夏国建都鄂尔多斯统万城，今鄂旗境内）。逐步扩占陕甘北部，伊盟、巴盟。在内蒙区域的建制则有夏、宥、丰、灵、定、威六州，均在伊盟境内。西夏国历经北宋、辽、金之兴亡，最后和南宋同被蒙古太祖

成吉思汗（1227年）所灭。今东胜县境适为西夏国旧地。《绥远通志·东胜》篇中称：“唐末，拓跋思恭镇此，其子孙遂割据，称西夏。自五代历宋辽金，始终为夏人所有”。根据此说，今东胜县境在这一时代为夏所有，宋辽金都未统治过。

元明时代（公元1279年—公元1644年）

元太祖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又二十年西征南下，至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灭南宋），改国号为元。元统一中国后，其建制是：全国设一个中书省，十一个行中书省（行省）。下设一百八十五路，辖三百五十九州，州再统县。今内蒙区域内曾设十三路。今东胜县境及伊盟境元初归西夏中兴路（因西夏败于成吉思汗，订立城下之盟而归附元）。不久废。将伊盟地域分属于东胜、云内二州

以及延安、宁夏等路。都隶属于元朝的陕西行省辖地。

另称：元统一全国后，在套内（鄂尔多斯地区）未设置路、州，而是属设在南部察汗脑儿（乌审旗境）为中心的领地。因察汗脑儿是元代北方通往奉元（西安）的重要驿站，是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元朝中期，曾在察汗脑儿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司”是元代设置仅低于行省一级的行政机构，而“都元帅府”是军事机构设置。据此，则今东胜县境当为南部察汗脑儿领地。

元末，内部发生内讧战争，加之中原农民大起义（朱元璋领导）。元在中原的统治便垮台了（公元一三六八年）。元末世皇帝逃回蒙古草原与其部落汇合，展开了对明王朝的斗争。

明初，其势力已达河套境内，明洪武年间筑东胜城，“并立屯戍，耕牧其间”。后改

为左右卫，其地域北至土默川，南至今东胜和伊旗境。十五世纪中叶，蒙古瓦剌部酋也先兼并了东西蒙古，大举进攻明都城（北京），迫使明庭订立城下之盟。也先退出居庸关，明庭亦放弃东胜这一塞外孤县（明初之东胜城）。民国《边疆调查报告书》称：“光绪三十年，议置抚民通判于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即郡王旗之板素壕地方，因其地在明代为东胜城，故名其曰东胜厅。”这是东胜县名称的由来。又称“明筑东胜城，后被淹没。”《绥远通志》，《内蒙古疆域考略》等史书对“明筑东胜城”都有记载，但就其方位都未作明确说明。因此，对于明初之“东胜城”的方位究竟在哪里，有待进一步考查。明庭退出河套地区，该地遂为蒙古侵入（明英宗灭顺时，约公元1457年）。

草原蒙古各部连年征战，为封建主巴图蒙

古兼并统一，称达延汗（明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〇年）。达延汗为了巩固其统治，将漠南蒙古分为左右二翼，共六个万户，派其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济农（郡王）驻鄂尔多斯境内，统领右翼三万户。公元一五三二年，巴尔斯博罗特济农死后，其长子衮必力克墨尔根袭济农职务，称彻辰汗，继续统领鄂尔多斯万户，后又被其次子阿拉坦汗占据。此时，今东胜县境尚在蒙古右翼境内（明世宗时）。右翼势力最强，有兵十万骑，据地鄂尔多斯，富饶乃为蒙古诸封建领地之冠。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宜于发展农牧业。蒙古右翼方面的鄂尔多斯部与明庭保持关系直到清庭入关，明亡以后，才完全成了清帝的藩臣（公元一六四四年）。

清王朝时代（公元1644—公元1911年）

清王朝害怕蒙汉联合抗清，采取怀柔蒙古

人与隔离蒙汉的政策，参照满族旗制建立盟旗制度，将内蒙全境分为东四盟西二盟。

清统治鄂尔多斯后，引起蒙古人的不满，顺治六年在大扎木素和多尔济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清统治的起义。当时以额麟臣济农为首的六名王公替清王朝效力，镇压了鄂尔多斯人民的起义，清帝论功行赏，于清顺治年间（1647年）把鄂尔多斯境内分为：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准格尔），左翼后旗（达拉特），左翼中旗（郡王）；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右翼中旗（鄂托克），右翼后旗（杭锦），并封此六人为各旗之扎萨克（旗长即王爷）。特封额麟臣为多罗郡王（实为盟长王爷）驻郡王旗（今伊旗）。公元一七三六年，乾隆又增建右翼前未旗即扎萨克旗（郡王、乌审旗中间地），授封于额麟臣的曾孙。

今东胜县辖地适为左翼中旗（郡王旗）和

右翼前末旗（扎萨克旗）牧地各一部，无有建制。

清初，严禁汉族劳动人民出塞，但自康熙中叶后，国力强盛，为开发地力，移民实边，设立山西归绥道垦务局，将大批陕北和晋西北农民迁往塞外开荒种地，由清王朝委派封疆大臣绥远将军主其事，东胜为垦区之一。其范围东至准格尔，西至乌审、鄂托克，南至神木、榆林界，北至杭锦、达拉特，这片广袤的土地，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二百二十五里，面积约一万四千六百五十方里（实测数）。至此农田日多，牧场日见缩小，土地开始沙化。蒙古牧民除少数放弃游牧转向定居生活外，大部分被迫向西、向北逐水草游牧而去。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绥远将军贻谷大臣看到东胜垦区境内民约七八千家，鉴于管理政事、民事之不便，就奏请清廷将垦区划

为与郡、扎两旗平行的政区。清廷准奏，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今板素壕设厅，因这里明初曾建东胜城，后被淹没，因此名曰“东胜厅。”特派抚民理事通判一人，专管东胜事务。至此，东胜设官置吏，成为山西归绥道（今呼和浩特市）直辖下的口外十二厅之一。后来垦界变更，又把治所移到羊场壕。

总上述，在整个清王朝时代，今东胜县境先隶属于清王朝统辖下的盟旗，划为厅后隶属于清王朝统辖下的山西归绥道。

中华民国时代（1911年—1949年）

民国成立后，实行大汉族主义，企图完全废除内蒙古的境界，采取存旗设县，甚至盟旗省县并存的办法（蒙不归县，汉不归旗），造成一地两主的紊乱局面。

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

将归绥道原有辖地划为“绥远特别区”从山西分出，实行晋绥分治。东胜厅亦改为东胜县，隶属于绥远特别区。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废特别区设立绥远省，今东胜县仍归之。然虽有其县治，但名不符实。自民国以来，东胜县境内地方荒凉，盗匪烽起，生活艰苦，县长知事亦有被杀之事，因此，委派的县长知事多不敢到任，寄居二百里外的包头而治之。更使此地兵匪勾结，民不聊生。到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已“地荒十之六，民亡十之五”。省政府看到东胜县长寄居包头遥治东胜不是办法，绥远省主席李涵础便命令东胜县长迁居县境以治之。当时县长王文泉只得走马上任，在今陶油房设办事处理政。后省府挪用救灾款一万二千元资助，在现市区内建设东胜县城。历时二年，于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十月建成见方一里的土

城。设有县府，公安局，县法院各一处。至此县政府从陶油房迁到东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民国以来东胜县县政建制概况

李廷辅

据史料记载，东胜县域于清末设东胜厅，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改厅为县，并设知事。对于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期间，东胜县知事为何许人，知事在什么地方办公等情况没有考究，不得而知。现就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这三十五年间东胜县政概况简述如下：

一、历任县长姓名、在职年代及政府所在地。

第一任县长阎茂，第二任县长裘世廉，约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至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在职。政府设在包头广生

店。当时东胜荒无人烟，交通不便，再加土匪出没无常，县长不愿也不敢到他所管辖的地区工作。平素只是派警务长带上几个兵到东胜巡视一趟，之后便返回包头。

第三任县长武尔功，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至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在职。县政府设在现东胜一完小东北拐角的一个小土围子里，仅有几间土房，那时叫文衙门。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衙门被土匪里勾外联放火烧毁，警务长赵龙潭被打死。县政府不敢在东胜办公，是年又搬回包头。新派第二任警务长夏俊卿到东胜，每巡视一趟，便返回包头。

第四任县长裴耀祖（字少卿）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至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在职。县政府设在陶油房（原属东胜，解放后划归伊旗）。

第五任县长乔朝海，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七月至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四月在职。

第六任县长王文泉，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在职。起初县政府仍设在陶油房，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王文泉在东胜城内筹建县城，翌年建成。从此县政府搬到东胜城内。

第七任县长芦呈瑞，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在职。

第八任县长邢宝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在职。

第九任县长陈聘三，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在职。

第十任县长马定国（字可一），民国二十

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至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职。

第十一任县长史其昌（字子克），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至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职。

第十二任县长王恩荫，于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上任，不久即卸任，在职仅几个月。

第十三任县长贾海峯，民国三十（公元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至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在职。

第十四任县长解宝武，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职。

第十五任县长樊库，民国三十四年（公元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在职。

第十六任县长贾克让,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春在职。

第十七任县长慕幼声,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春上任,直到绥远和平起义(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但起义后新政府没有派员,慕的县长便一直延到一九五〇年三月,我党派冯开选接任县长时为止。解放前慕身兼数职,曾任东(东胜)、桃(桃力民)、达(达拉特)治安司令、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并兼任东胜县县长。

二、县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变革:

第一任县长至第四任县长,因县政府不在东胜,机构设置不清楚。

王文泉任县长期间,设有一个科,科长王

文彦，是王县长的同学。一切行政、事务，均由这个科处理。设有警察局，第一任局长叫杨在春，第二任局长叫营天祿，第三任局长叫刘子英。警察局下设巡官一人，有警察一朋人（十人左右）。设有法院，县长兼院长，承审员叫阎玉玺，录供叫张守恆。

从第七任县长至第九任县长，政府机构基本未动，只是工作人员有些变更。

第十任县长马定国时，增设秘书一人，名叫张伯平，是马县长的同学。设有一个科，第一任科长叫牛纪纲（字礼山），因该人是学法的，后调任审判官。第二任科长叫张希贤，另增设民训处，主任叫李松如。主要任务是宣传、推行政令，组织民众，登记闾、邻，防奸、除奸等。增加辅导员一人名叫李廷辅，主要是协助民训处工作。其时，警察局局长是高朗峯，法院院长由县长兼，牛记纲任审判

官，录供叫郑永年。

史其昌任县长期间，秘书由崔振孝担任。在原来一个科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两个科。第一科长崔振孝兼管民政；第二科科长李盛林、第三科长白雪琴，分管财政、教育。原来的警察局改为保安处，处长由县长兼，副处长叫王瑞森。保安队长陶玉良。法院院长仍由县长兼，审判员韦泽生。增督学一人，为李先唐，实际由李廷辅担任。

从十一任县长至十三任县长，政府机构基本没有变动，人员变动也不大，只把秘书换成他们的亲信。如王恩荫当县长时，秘书由他的同学李治芳担任。贾海峯当县长时由他的妹夫李治芳继任，贾手上增设了一个民教馆，负责社会教育，馆长李廷辅。解宝武当县长时，由他的老同事霍绍先担任秘书。这几位县长任职期间，审判官一直是刘锦魁担任，抗日胜利

后，此人调绥远省法院工作。

樊库任县长期间，政府机构比较完整，分工比较明确，大致情况如下：

秘书张维民。民政科长：第一任李盛林，第二任杨异翹。财政科长乔占英、会计室主任郝虎文。建设科长李艳田、阎海聪。教育科长余思远，督学赵昇平。军事科长左开景。法院审判官：第一任刘锦魁，第二任弋树棠。警察局长陶玉良、田赋处长王世英。田赋处专门管理田赋粮（岁租粮）、军粮（统计粮、马料）、公教粮（专门供县、区、乡干部及教师的薪水）。

第十六任县长贾克让任职期间，政府机构基本同前，只增设了一个人事室。其人员是：秘书余世泽，民政科长李盛林，财政科长郝虎文，会计室主任王生柳，建设科长李生华、赵文昇、胡建功，教育科长赵昇平，军事

科长刘子厚，人事室主任师学之，审判官弋树棠，警察局长王亚夫。

最后一任县长慕幼声任职期间，正是解放前夕，机构没有变动，当时人心惶惶，政府内部混乱。秘书焦钟汉系慕从达旗组训处带来的，解放后被镇压。

三、农村基层政权设置及变革：

建县至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农村政权设置，据说设有东、南、西、北区，外加一个台站区，共五个区。每区设区董及保董。区董分管财政事务，保董掌管地方兵权及地方治安。区下设有若干个牌，牌的负责人叫甲头，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牌是基层政权单位。

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至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农村仍设有五个区，区下设牌。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

年)为完善农村政权,更便于统治人民,牌下又设间、邻,邻为基层政权单位。

东区。第一任区董叫陶四,第二任区董叫杨毛旦。第一任区队长叫王三计,第二任区队长叫张步成,第三任区队长叫张春和。该区的五个牌是:头牌,在今伊旗古城壕一带;二牌,在今伊旗淖壕一带;三牌在今伊旗忽羊兔一带;四牌在今皂火壕一带;五牌在今马莲圪卜一带。每牌有正副甲头各一人。牌下设有若干个间,职称叫间长,后改为村长。间下设若干个邻,其职称叫邻长。(以下各区均如此)。

南区。第一任区董叫韩召虎,第二任区董叫武国和。区队长由区董兼。该区的四个牌是:头牌,今伊旗补莲塔一带;二牌,今伊旗木独十里一带;三牌,今伊旗松道沟一带;四牌,今乌审旗万寿地一带。

西区。区董贺文富。第一任区队长高继先，第二任区队长杨文斌，第三任区队长赵成壁，第四任区队长崔宽则。该区的五个牌是：头牌，今巴音敖包的山炭庙一带；二牌，今泊江海子的桃力庙一带；三牌，今柴登一带；四牌，今板担梁一带；五牌，今什股壕一带。

北区。第一任区董王永昌，第二任区董王永山，第三任区董武侯为。第一任区队长刘道宽，第二任区队长武侯为兼。该区的六个牌是：头牌，今补芦沟一带；二牌，今九成功一带；三牌，今板素壕一带；四牌，今色连一带；五牌，今羊场壕一带；六牌，今巴彦门肯一带。

五区：（四、五、六台站区）第一任区董杨在普（杨七），第二任区董杨文斌。区队长由西区的区队长兼任。该区的六个牌是：头牌，今杨七寨子一带；二牌，今伊旗奎素一

带；三牌，今伊旗塔并庙一带；四牌，今杭旗西井区一带；五牌，今伊旗大康板一带；六牌，今杭旗卯开十里一带。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史其昌任县长期间，废牌、间，邻，建区、乡、保、甲。甲为基层的政权单位。其设置如下：

一区（原来的北区），区公所设在巴彦门肯。第一任区长王司中，第二任区长霍绍先，助理员武侯为，区队长武侯为兼。区以下设乡。

一区的八个乡是：

隆盛乡，今罕台乡隆盛兴一带。

九成乡，今罕台乡九成功一带。

土盖乡，今罕台乡土盖沟一带。

色连乡，今罕台乡色连一带。

羊场乡，今羊场壕乡羊场壕一带。

水头乡，今塔拉壕乡水头沟一带。

丰盛乡，今塔拉壕乡旧庙沟、丰盛西一带。

巴彦乡，今羊场壕乡巴彦门肯一带。

二区（原来的东区），区公所设在陶油房（现属伊旗）。区长李廷辅、王瑞杰，助理员杨毛旦，区队长张春和。该区的五个乡是：

古城乡，今伊旗新庙一带。

柳塔乡，今伊旗纳林塔一带。

忽羊乡，今伊旗忽羊兔一带。

吉乐乡，今布日都梁乡吉乐庆一带。

马莲乡，今羊场壕乡马莲圪卜一带。

三区（原来的南区），区公所设在花亥兔（今属伊旗）。区长韩廷瑞，助理员武国和，区队长武国和兼。该区的五个乡是：

补莲乡，今伊旗补莲塔一带。

木里乡，今伊旗木独十里一带。

马城乡，今伊旗马城壕一带。

松道乡，今伊旗松道沟一带。

万寿乡，今乌审旗万寿地、沙特亥一带。

四区（原来的西区），区公所设在塔拉，区长韩泽南、郭文明、武建康，助理员贺文富，区队长崔绪姜。该区的五个乡是：

巴音乡，今巴音敖包一带。

什股乡，今巴音敖包乡的什股壕一带。

漫赖乡，今漫赖乡一带。

板旦乡，今柴登乡一带。

台什乡，今柴登乡在台什壕一带。

五区（原四、五、六台站），区公所设在杨七寨子。区长张步清、张明清，助理员杨在甫（杨七），区队长解根喜。该区的五个乡是：

桃黎乡，今桃力庙一带。

加特亥乡，今伊旗纳林什里一带。

塔并庙乡，今伊旗塔并庙一带。

奎素乡，今泊江海子一带。

西井乡，今伊旗小康巴一带。

每个区区长管全盘，助理员管行政事务，区队长管地方武装。每个区各有区兵十余人。

以上建制一直延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樊库接任县长后，废区重建乡，保留保、甲制度。乡名以仁、义、礼、智、信编排。即：

仁丰乡，今塔拉壕乡旧庙沟一带。

仁义乡，今羊场壕乡郝兆套一带。

仁和乡，今罕台乡色连一带。

仁盛乡，今罕台乡隆盛兴一带。

仁成乡，今罕台乡九成功一带。

义乐乡，今布日都梁乡皂火壕一带。

义信乡，今布日都梁乡板洞梁一带。

义和乡，今伊旗淖壕一带。

义成乡，今伊旗古城壕、土盖沟一带。

礼仁乡，今伊旗木独什里一带。

礼让乡，今伊旗松道沟一带。

智勇乡，今巴音敖包乡一带。

智和乡，今什股壕山炭庙一带。

智廉乡，今柴登乡板担梁一带。

信义乡，今杨七寨子一带。

信成乡，今伊旗塔并庙一带。

信恆乡，今伊旗小康巴一带。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樊库又把以上十六个小乡划成八个大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编排。即：

忠恕乡，今羊场壕乡、塔拉壕乡及天漫梁乡的部分地区。

孝友乡，今罕台乡一带。

仁乐乡，羊场壕乡的郝家圪卜、布日都梁

乡。

爱民乡，今伊旗的纳林塔、新庙一带。

信义乡，今杨七寨子一带。

信成乡，今伊旗塔并庙一带。

信恒乡，今伊旗木独什里一带。

义勇乡，今板旦梁一带。

以上乡、保、甲制度一直延到解放前夕再无变动。

东胜县参议会始末

李先唐

我曾参与国民党时期东胜县参议会的组建工作，并担任过议长。这段经历虽然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讲出来，也可以作为资料，以供参考。对忆述中的错误和遗漏，希望知者予以指正或补充。

一、建立参议会的背景

东胜县参议会筹建工作始于一九四六年。

东胜县从民国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一二—一九四五年）的三十多年间，没有建立过任何民意机构，连打算也没有人提出过。但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却迫不及待地要在东胜县筹建县参议会。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继续维护其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反对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撕毁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内战，妄图从军事上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扬言要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于是指令国统区的省县加快筹建参议会，进而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以欺骗舆论，强奸民意，为其法西斯统治合法化，装璜门面，妄图把不要和平民主的罪责转嫁于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东胜一伙效忠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头目及士绅代表，迎合蒋介石的独裁意旨，开始了筹建东胜县参议会的活动。

二、筹备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春，专员陈国祯、县长樊库，

县党部书记长康逸山，在蒋介石的旨意下积极开始进行筹备工作。首先邀集东胜地方上层分子如李先唐、陶世英及士绅代表贺文富等人，发起组建事宜，物色确定议员人数和议员人选。当时全县共十六个乡，每乡出议员一人，城内工商界一人，妇女代表一人，共十八人组成。

参议会会议员的后选人，都是由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提名指定的。名义上交各乡选举产生，实际上各乡的老百姓连拳头都没有举过，这些人就当选了所谓的县参议员。这些议员的出身多为高门贵户。除了几个议员（王根亮是兵痞，张清源是开小药铺的商人，李莲芳虽是小学教师却是当时邮政局长奥书斌的老婆。张金驹是中农，曾当过甲头村长、乡长），其余的议员都是绅家大户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我的记忆中，先后当过议员的是：杨在普、张

仲臻、杨文焕、韩廷瑞、韩子良、赵维九、何世民、王明星、张继雄、陈步云、李先唐、陶世英、韩文忠、王根亮、李廷辅、刘永珍、张金驹、李莲芳、张清源等人。

一九四六年五月，这个由县长和国民党书记长一手把持包办的第一届参议会，在县政府正厅正式开幕了。当时，驻东胜的国民党党政军头目全都到会祝贺；东胜城内大小机关也都派列席代表参加。这次会上选举李先唐为参议会议长，陶世英为副议长。接着县政府向各乡要料摊工，给县参议会修建了一处机关驻地，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完工。参议会的组织机构建立后，任命李澄（李静泉）为秘书，下设文书事务员。当时是李海、李济、李杰、牛兆琏、许子仪等人。县参议会就开始办公了。参议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以东胜县参议会为基础扩大为伊盟三县处联合参议会。指定达

拉特旗组训处康民众，桃力民办事处的韦泽生为副议长；两处的各方也指选了一名议员，使县参议会进一步扩大。当时的议长、副议长、参议员都是义务职，没有薪水，没有补贴。只有秘书、文书、事务员赚薪水。

三、参议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参议会主要活动是每年举行四次例会。每次例会由正副议长主持，会上首先由县长及各科室负责人作工作报告，然后听取议员提出咨询或动议，最后把多数议员通过的咨询或动议集中起来，提交县政府，执行不执行由县长决定。参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有名无实。至于县长民主选举的工作自参议会成立以来就从来没有进行过。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军事动员，给省县两级参议会又加了所谓“戡乱动员”的任务。县参议会又成立

了“戡乱动员委员会”，由县长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议长担任副主任，参议员自然就成了“东胜县戡乱动员委员会”的委员。这是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年底下达了剿共密令后的变化。这就使参议会变成了反共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助纣为虐的反动机构。

一九四七年，东胜县遭受了先旱后雨继而冰雹霜冻的严重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基本上是颗粒无收，饿殍遍乡野。一九四八年春天东胜县的参议员高郎峯在原《绥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河西五十万人民的呼吁”一文，东胜县参议会部分议员又组织了一次赴省请愿，要求省政府赈济河西灾民。这些活动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省政府给了一部分救济粮款，具体数字不清楚，发放在多少户头上也没统计。救济粮款都由东胜县民政科经手发放。这是参议会成立以来做的一点有益于人民

的工作。

县参议会还帮助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美政府中华救济团给当地的救济物资。一九四七年“善后救济总署”派第五工作队的李逢唐携带一批救济物资和救济款来到东胜。县参议会全力以赴协助李逢唐了解情况，分配救济物资和救济款。因为这批救济物资包括伊盟各旗、县、处，分发下去后又到各旗、县、处监督发放情况。又由于这次发放中关卡太多，好的着眼的物资，各旗、县、处、乡层层捞，中饱私囊，真正发放到被救济者手中的只不过是些残羹剩饭破破烂烂而已。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统治及其各级官员贪污堕落的现象，由此也可见一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解放了达拉特旗组训处和东胜县城。不久又在李飞雄寨子全歼东胜自卫团。伊盟支队估计到黄河

解冻后会派军队来，决定撤离东胜。伊盟支队撤走后，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陆续回到东胜城内。这时东胜城内没有一个兵，人心惶惑无法留驻。联合参议会马上召集会议决定向省主席董其武发通电，要求省里速派军队来东胜驻守。董其武接电后，就派刘万春的军队和邬青云的骑六旅来到东胜。后来刘万春又纠合达旗两个自卫团进犯准旗解放区攻打纳林，对解放区的老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和抢劫。刘万春走后就 把邬青云的骑六旅留驻东胜。这股土匪部队在“九一九”起义前就成了东胜县、准、伊两旗边境的祸害，弄得广大农村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绥远全省和平解放，东胜县参议会大势所趋，基本停止了活动。机关关门，人员四散，等待接收。同年十月，董其武派安春山为代表来东胜接管驻防

部队，并着手部队的改编和县政府的改组。旧军政人员都进行登记造册，凡上册者都为起义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一九五〇年伊盟自治政府划归绥远省管辖，伊盟政府派员接管了东胜县政府，就此，东胜县参议会随县政府办理了接交手续。东胜县参议会也终于寿终正寝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

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和三青团干事会的组建及其活动

李廷辅 刘继祖

一、国民党县党部的组建

抗日战争中期，东胜县人氏高朗峯（又名高广耀），在绥远、包头有很多显贵要人是他的同学、朋友，如绥远省党部委员潘秀仁等人。这时，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认为东胜建党成熟，高朗峯又是个人才，故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指定高朗峯组建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在高的积极活动下，东胜县党部于一九四二年建成。

各级党组织的任务

国共合作时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宣传国

民党的政纲、政策；宣传抗日防奸除奸等。国共分裂后重点就是防共。为了防共，党政、军均建立了“军警联合稽查处”。

历任县党部的组成情况

第一任县党部书记长高朗峯。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职。

县党部由书记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监察委员组成。主要工作人员是：秘书兼干事康逸山（不久由贺万轩任专职秘书）；录事有孟志荣、苗德秀、李振华。

高朗峯任职期间主要是突击发展党员。因为初建党，党部工作人员都是非党干部。第一批党员是在一九四一年发展的。发展的对象是党部工作人员、城内机关干部及商界一些知名人士。第二批党员是调回县里开会的区、乡干部。为今后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创造了条件。

高朗峯于一九四四年调任米仓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在包头被镇压。

第二任书记长是曹克让。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职。

主要工作人员是：秘书康逸山；干事孟志荣、陶立栋；助理干事李振华。

曹克让于一九四五年病故。

第三任书记长是康逸山。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任。

主要工作人员是：秘书李生瑞；干事孟志荣；助理干事李振华。

康逸山于解放后在东胜被镇压。

基层组织情况

以区建立区党部，以乡或学校建区分部。各级组织均由书记、组织、宣传、监察等委员组成委员会。最基层是党小组，约十个党员为一个小组。

组织发展

按规定个人提出申请，逐级上报，批准权在县党部。实际上有些国民党员，个人没有申请，县、区、乡认为可以，填个表报县党部就批了。所以不少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员。

组织发展大部分是采取集体加入的方式，如利用训练班、开会等机会举行。也有个别发展的。入党的条件是二十五岁以上被认为是精明、强干，忠诚老实的人。入党必须有两个党员介绍；每月交纳党费两角。

二、东胜建立三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经过

一九四一年春天，三青团绥远支团部派王昶弟在东胜组建了“中国三民主主义青年团东胜分团筹备处”。主要负责人是王昶弟和张登云。下设组织股（股长是姜运文）、宣传股（股长是胡保善）、总务股（股长是乔增瑞）。各股的工作人员叫录事。三青团工作主要对象是广大

青年。按照团章的要求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青年中发展团员。发展方式一般采取集体发展和个别发展。东胜县三青团支团第一批团员是在罕台庙城厢小学适龄青年学生中发展的。当时由张登云在学生中作了动员报告，然后给够年龄的青年每人三张表进行登记，最后由张登云主持了宣誓大会，发了临时团证。以后陆续在城厢小学，包头的哈尔土小学，达旗组训处处立中心小学相继都发展了三青团员。也有的是三青团的团员到农村经过个别谈话填表登记发展的。团的下层组织是区队和分队，分队是团的最基层组织，每十至十八人就可建立一个分队。每个星期组织一次分队会议。每年三月二十九日定为青年节（辛亥革命黄花岗烈士蒙难日）。东胜三青团每年都要举行庆祝活动。

一九四二年夏季，东胜三青团筹备处改为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东胜干事会。第一任干

事长是王昶弟，第二任干事长是张铭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七年春天，东胜三青团组织人力分赴全县各地进行团员甄核登记，登记表一式三份每人填一份，大约四月份，凡是参加过甄核登记的团员在团部院中又举行了正式宣誓，把临时团证换成正式团证。同年冬季，东胜党团奉命合署办公。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东胜已临近解放，国民党党、团机构涣散，人员到处流窜，没有来得及党团正式合并，东胜就解放了。

东胜地区军事情况

李廷辅 李先唐

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将满八旗兵一部分驻守都城，一部分驻防全国重要城市，形成对全国军事镇压网。当时在内蒙古地区的西部，设置绥远将军，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也驻有满八旗兵军队。各蒙古部设旗，这是个军事行政合一的机构。清王朝，为拢络蒙古封建王公贵族，提倡满蒙一体。把蒙古部的各翼编为旗，加封蒙古族王公贵族为各旗的贝勒或扎萨克，也称王爷，为世袭制，成为一旗的军事行政首脑。那时规定蒙古人男十八岁到六十岁有服兵役的义务（喇嘛沙比除外），是为壮丁，蒙古兵全部编为骑兵，每一百五十丁设佐领一人，每一佐领下设骁骑校一员，领催六员。佐领多少按旗内的壮

丁数而定，大旗多设，小旗少设。蒙古兵就是清王朝蒙古部的常驻军队，各旗不驻满八旗兵。那时，东胜县地域属于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和右翼前末旗（即原郡王旗和扎萨克旗）牧地各一部分，无任何军事建制可言。

清末，郡王旗开始放地开垦，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设东胜厅，隶属于归绥道管辖。当时东胜厅设立文武两个衙门，武衙门有统领下辖二十多个衙役，衙役就是东胜最早的兵。辛亥革命后，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东胜厅改建为县，县设警佐，下设警察若干人。全县划分为六个区，每一个区设保董（后来改为保安队长）一人，统带十几个区兵。警察区兵就是东胜县最早的地方武装。民国年间，东胜境内土匪烽起，民不聊生。地方绅家大户为打击土匪骚扰，各区都扩大保安队，全县设立总团，统率全县各区保安

队打土匪。可是匪患依然不息。因此，省府曾陆续派部队来东胜剿灭土匪。先派尉司令的骑兵来东胜剿匪，结果尉司令在剿匪中牺牲。又派赵承寿的骑兵旅黄马队、黑马队来东胜驻防。杨侯些大股土匪在伊盟活动时，省里又派王靖国的十七师两个团，即四〇一团、四〇七团来东胜剿匪。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芦呈瑞任东胜县长时修建了西营房，在彻底消灭杨侯些大股土匪后，四〇七团刘良湘的部队就留驻在东胜城内。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进攻绥包地区，阎锡山放弃绥远把部队撤回山西。

绥包沦陷后，东胜成了国民党游勇散兵汇集的地方，土匪刚肃清，接踵而来的是兵灾。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来东胜集结的军队叫五路自卫军，是由包头、固阳、萨托二县等地方保安队凑合成的乌合之众，总指挥是包头的地方绅

士刘孝先，后被国民党调遣到神木改编为五十八军，不久军队哗变，士兵纷纷跑回东胜及达旗沿滩地区。一九三七年秋后，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军队由河东移防来东胜。东北军因远离家乡，士兵逃亡很多，为了补充兵员，该军从东北到绥远沿途陆续收罗了不少土匪之众，加上部队补给困难，该军所到之处见衣服就抢，见牛羊就宰，骚扰老百姓不得安生。当时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不少爱国青年和爱国志士，对马占山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放弃抗战的行为及部队来东胜驻防为非作歹表示深恶痛绝。据说军部有个叫王义的女青年给马占山写了遗书，在悲痛中用枪自杀以示抗议。马占山将军马上派他的直属部队到东胜各地筹集军粮惩办为匪作歹的部属士兵，军纪才稍为好转。一九三八年年初，马占山部队移防府谷哈拉寨。

马占山的部队走后，榆林二十二军八十六

师派五一五团、五一二团来东胜驻防，又把五十八军哗变的段宝山、王锁子、张步程、陈炳义、韩祥符等部队收编为一至五个支队。除韩祥符的四支队留驻罕台庙一带，其余的都派到沿滩驻防。一九四〇年，东胜城内只驻五一五团李涵芳一个营的兵。黄河封冻后，日本军从包头派了两千日伪军在森盖的带领下进犯东胜。在李涵芳营长的指挥下，经过一天一夜的坚守战斗，大批援军赶来，打退了日伪军的进犯，保卫了东胜这个战略要地。李营长因此也受到东胜人民的称赞。这以后五一五团被调走，又派五一二团来东胜驻防，成立了以团长张子英为首的东胜城防司令部，加强对包头日本军的防犯。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以后，蒋介石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傅作义也在军政内清查共产党。蒋介石和傅作义为了加强对付陕甘宁

边区的共产党，北防日寇，在东胜建立了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任命陈长捷为守备军总司令。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稽查处几个部门，直属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从此，驻防伊盟的国民党部队都归陈长捷指挥。当时在伊盟驻防的骑七师，何文鼎的二十六师，准旗马占山的部队，都由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指挥调遣。陈长捷的外号叫陈屠家，在东胜期间积极反共，残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同时他还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向伊盟七旗强迫进行征粮、要草、要军马，强迫各旗王公开放牧场开垦种地，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九四三年伊盟“三二六”事变。此事件中，陈长捷调派骑七师对扎萨克旗人民进行血腥屠杀和镇压。一九四三年七月份，蒋介石到宁夏召见陈长捷和傅作义，宣布停止放地开垦，并撤销了陈长捷的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冬天派傅作义带

了大量钱款到扎萨克旗安抚伊盟各旗；同时派三十五军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来伊盟驻防。一九四四年派一个团的兵力进驻扎萨克旗。在此期间，安春山诱捕杀害了扎萨克老沙王的三儿子和老赖排长。安春山的三十一师走后，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又派孙兰峯率其部暂编第三军的十一师来东胜驻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撤走。

一九四六年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伊克昭盟的军事部署，在东胜又设立伊盟警备司令部，任命陈玉甲为司令，统帅伊盟七旗的保安司令部和警备师及伊盟三县处的四个地方团（指东胜县、桃力民办事处，耳字壕组训处），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伊盟。东胜原来没有自卫团，陈玉甲来东胜后，指使县长贾克让组织自卫十六团。贾克让自任团长，把地方上凡是有枪的大户都收编起

来，并任命张继雄为副团长，李澄（李静泉）为团副，陶立栋为军需主任。下属四个大队，大队长是杨文焕、王珍开、赵起胜、陈步云。大队下设连排。各乡自备马匹枪支弹药武装自己的士兵。“十六团”就这样组建起来了。一九四七年准旗、伊旗东部解放，十六团这支乌合之众，经常派遣小股部队到准旗西部和伊旗东部进行骚扰抢劫活动。一九四九年春天，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剿灭了达拉特旗组训处，又来解放东胜。东胜十六团当解放军到来之前，就撤出东胜流窜到色连、板洞梁一带。当时伊盟支队副司令员高平、政委高增培写信派贾德义到十六团团部，给他们讲清战争形势，劝他们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争取起义。但是这支地主武装根本不听劝解。团长贾克让更是顽固到底死不悔改。后来伊盟支队要撤离东胜，十六团听到消息，觉得他们当时一枪也没有打就把东胜

城丢了，很不光彩，就部署骑兵在伊盟支队撤离东胜前夕，集中火力在东胜西城墙外打一阵，好像他们把解放军打跑了，好有脸回东胜城，继续为非作歹。结果适得其反，十六团偷打东胜城内的解放军，激怒了高平副司令员。第二天凌晨，解放军跟踪追击，在罕台庙附近全歼十六团步兵。接着在李飞雄寨子全歼十六团的骑兵，副团长张继雄、大队长杨文焕等人都当了俘虏。侥幸逃脱的大队长王珍开、陈步云后来又把打散的十六团部属集中起来重建十六团，“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一九四九年，黄河解冻后，董其武派刘万春统带鄂青云的骑六旅和高礼亭的十三旅进驻东胜。不久，刘万春派军队攻打准旗纳林镇。并以通匪罪捕捉了十六团团副李澄（李静泉），押解到归绥（今呼市），贾克让又以通匪罪枪杀了杨康焕。刘万春走后，留下

鄂青云的骑六旅在东胜驻防。同时二十二军也派王锁子团和石佩玖团在一九四九年春夏来东胜驻防，骑六旅被派到东胜和伊旗边境驻防。

“九一九”起义前，董其武任命达拉特旗组训处长慕幼声为东胜县长，设立伊盟治安司令部，同时委任慕幼声为治安司令。“九一九”起义后，董其武又派安春山来东胜整编伊盟部队。一九五〇年初，伊盟所有旧部队全部撤走。三月份解放军骑五师和伊盟支队陆续来东胜驻防。从此东胜地区军事史开始了人民武装力量新的历史。

一九八二年八月

东胜地区的匪患

李先唐 李廷辅

土匪为患的历史背景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虽然赶走了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的声势还不能威震边远。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动乱时代，特别是东胜这个边远地区，“山高皇帝远”，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的地方，正是土匪产生和出没的场所。加之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领导权，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更给那些在新旧交替和军阀混战中的游勇散兵，以及流窜的无业游民，造成聚众为匪，占山为王的机会。总之，由于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给土匪的产生和猖狂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东胜地区过往的主要土匪概况

卢占奎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最早窜来东胜的土匪头子。这股土匪原是清政府绥远将军手下的绿营兵，卢占奎就是这帮辫子兵的都统，原驻包头固阳一带。清政府被推翻后，断了补给来源，卢占奎本人又不愿归附民国，于是带领他的队伍从固阳的黑教堂出发，西进河套南至伊盟东胜，到处游动抢劫，危害社会秩序。这股土匪最后流窜到绥东地区被驱散消灭。

卢占奎走后从陕西府谷的游民中聚集了一股土匪，窜到伊盟东部及东胜地区进行抢劫活动。接着是萨托二县及达旗黄河沿岸游民散兵集结的多股土匪。如苏三、兰三、侯洞林、马虎城、陈秉义、金赤劳、刘喇嘛、鄂班定等土匪头子都是各自带领一伙人，冬天黄河封冻后在大青山以南黄河两岸打家劫舍，黄河解冻

后就窜来伊盟各地为非作歹。这些土匪每股人数不多，但股数相当多。彼来我往，防不胜防。在这些土匪活动的影响下，当地也有些不务正业的人也乘机为匪。他们白天不动，晚上三五结伙戴上假面具，拿上假武器进行抢劫活动，造成遍地是匪，匪乱不堪的局面。这个期间还从河东窜来赵有祿和苏有生两股武装土匪。赵有祿被收编后，苏有生窜到宁夏，进一步扩大势力并控制了宁夏，还当了一个时期的省主席。

在东胜一带活动的土匪，最多的一伙是以杨侯些为首的土匪。这股土匪原活动在后山、河套，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窜来伊盟东胜境内。杨侯些自称旅长，下属康存良、陈秉义、史文华三个团，共两千多人，盘据在伊盟境内，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才被彻底肃清。

土匪的作恶罪行

抢劫财物：主要抢劫金银财宝、大烟土和好马匹。做法是要钱不要命，捉住人就要钱。如果不给就是绳捆棒打，烧红火剪铁匙烫，只要满足他们要求的财务数目或全部交出财物就算了事。请财神：如果捉不住当家主事的人，就把小孩或家里其他成员带去，土匪管这种人叫“财神”。土匪对“财神”只是严加控制，拿这些人质讨价还价。只要请上当地与这些土匪头子熟悉的人当说客，根据土匪的要求，交了钱就放人回家。对没钱的人，土匪则带上一个时期，只要有人说合，多少送点人情也就放了。如果没人说合，土匪也了解这些人无油可榨，就叫喂马服劳役，慢慢地放走或逃跑了也算了事。

奸淫妇女：凡是土匪头子都要抢夺闺女媳妇，随身带着进行奸污，或者据为己有，长期

霸占。众匪按土匪的规矩不能随身带女人，所以那些一般匪徒每到一处，只要逮住妇女不论老少随便奸污，有的妇女被轮奸致死致残，甚至几十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

纵火为患：由于土匪的猖獗活动，人们到处游动逃避。土匪每到一处捉不住人，就把人家的粮草喂完，杀牛宰羊吃，最后把房舍也要放火烧光。多少人家的房舍被焚烧毁掉，就连东胜县政府的房屋也都几次被土匪纵火烧掉。为避匪患，几任县长都是住在包头的广生店办公不敢回东胜居住理事。

毁坏青苗：夏秋两季土匪的骑马走到哪里就把马匹放到青苗地里，只要土匪走到哪里，哪里的青苗基本吃光踩坏，农民辛苦一年，被土匪糟踏殆尽。这种匪祸甚于天灾，广大农民叫苦连天，无处诉说。

平定土匪的斗争

东胜建县后为了保卫地方安全，各区都设立了保安队，就是地方武装。在小股土匪活动时期，全靠这些地方武装抵抗。如东胜西区的杨金柱、杨绵羔都曾任全县保安队的团总，带兵打击流窜的土匪，后来都在作战中牺牲。北区保安队的区保董刘银罗，也在添漫梁与土匪战斗中牺牲。以后他的侄儿刘道宽继承了保董职务（保安队长）。在他的领导下赶走了杨侯些部康存良团的土匪。据说在一次战斗中刘道宽设了埋伏，打死康存良的侄子康三三，夺取了康存良的骑马，同时打死了他的帮凶脱手杨（外号）。刘道宽还获取了脱手杨的两个小老婆，一个给他自己做了妾，一个送给他的部下郝九牛做了妻。刘道宽一下成了名扬黄河两岸打土匪的英雄。

伊盟土匪的彻底消灭，还是傅作义当了省主席，绥远成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之后的事。最

早是派綏远蒙古骑兵尉司令带兵来伊盟剿匪。尉司令带兵在东胜西区剿匪中被土匪俘获后被害。接着阎锡山派赵承授骑兵旅黄黑马队未到东胜剿匪，基本肃清了当地的小股土匪和地方土匪。这以后阎锡山又派王靖国步兵十七师驻在包头，向东胜派来四〇一团和四〇七团两个团的兵力，在伊盟各旗县保安队的配合下，在乌审旗南的白舍牛滩消灭了匪首杨侯些。但是其部属史文华还在伊盟到处流窜。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留驻东胜的四〇七团，在团长刘良湘的指挥下才把这股土匪赶到神木以南，并被井岳秀部收编，至此伊盟境内的土匪才算基本肃清。

一九八二年六月

解放前的东胜县教育

边媚山

(一)

清以前的东胜，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山野草地”。蒙族牧民过着游牧生活、汉族农民“跑青牛犊”。后来从陕西、山西逐年流来一些贫穷的老百姓开始定居。由于土地肥沃，这些人中不少很快就富起来了，与此同时，在个别富户中开始办起了家庭书房，请个先生给自己的儿女教书，他们不抱多大希望，能念三两个冬书，识个糜麻麦谷豆，帛布绸缎等常用的庄户字，会记个往来帐，就认为不错了。所读的书也不外乎是《百家姓》、《三字经》、《坐铺》、《名贤集》之类，这种形式的教育在东胜地区来讲也是不多的。

约在民国十二、三年（公元1923—1924）年，由几家学董联合筹办私塾，以自己的子女为主，接纳一部分邻村的儿童，借一两间民房，念书娃娃自己搬一张书桌，带一个沙盘，就可以念书了。先生的费用，均由念书娃娃负担。一般说来，念一个冬书，每个学生给先生负担吃米一斗、肉食三斤、烧酒一斤、素油一斤、水烟一片、茶叶一方。学习的内容基本同前。这种形式的私塾，全县也不过两、三所，入学人数超不过三十人。

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东胜县官方在今羊场壕乡圪堵村张进财院（羊场壕第一家向垦务买地的老户，字号叫《福源泉》，办起一所“洋学堂”，把一些从家庭书房及私塾念过两、三个冬书的学生集中起来教念《四书》、《五经》，叫做开讲，另外加授珠算。所谓“洋”，大概就是教师的薪水由

官方付给了。先后在这个学堂教过书的是刘恆令、高耀先、解守瑛，他们几人是东胜第一批去绥远、包头上过中学的最有文化的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东胜县官方又在城里办了一所初级小学，主任教员是李静泉，教员是王瑞杰，他们算是东胜在绥、包上中学的第二批人才。这个学校共有三十多个学生，开设的科目是国语、算术。

上述不论那种形式的私塾还是学堂，不论城里还是乡下，都没有巩固下来，时而倒闭，时而办起。始终连个高级小学也办不起来。因此，要想上高小，还得去包头。

（二）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日本对我国进行全面侵略，绥、包一带亦已沦陷，东

胜仅有一所小学也倒闭了。就在这年冬天，由李在虎、边来喜、杨相柱三家大户组成学董会，筹办了一所私塾，校址设在今羊场壕乡的什拉乌素村李在虎院内，这三户人家就有七八个孩子，连同周围村子里的小孩共有二十多名学生在这所私塾里读书，教师由边凤林担任。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县政府看到这所私塾办得不错，决定改为公立小学，先后派王瑞杰、李适唐、柴儒到这所小学任教。城内及较远的农村学生也纷纷来到这个学校读书，学生发展到五十多人。

因为绥远沦陷，在外地工作的本县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如高朗峯、李廷辅、李先唐等都相继回到东胜，他们的思想比较激进，眼界比较开阔。如高朗峯是当时政界比较活跃分子。他们认识到东胜人之所以受人欺侮，其主要原因是文化落后，教育经费被官方贪污，少办或

不办教育是当权者的指导思想，东胜人决不能上这个当。在这种情况下，李廷辅挺身而出要办教育，辞去区长、科长职务不干，他的这种举动得到东胜政界及本县知识界的支持，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县长马定国被迫点了头。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把什拉乌素这所小学搬罕台庙（这个庙仅住的二十多个喇嘛，房间很多，因李廷辅和大喇嘛长木素的关系很好，校舍全部是借用喇嘛的房子），校名定为“东胜县城厢小学”。李廷辅任首任校长，学生发展到近百人，教师有八、九名。教师均由校长聘请，有的是从神木、府谷请来的，有的是包头沦陷后流亡到东胜逃难的人员，所聘教师最低是初中文化程度。课程开设有国语、算术、常识、历史、地理、自然、音乐、体育、美术和手工。由于条件差，刚开始是复式教学，但毕竟一所完全小学的架子算搭起来了。

校长李廷辅一面领导教学，一面到农村向大戶搞募捐，发动羣众献工献料，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盖起了教室，并解决了桌凳问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由复式教学改为单班教学，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全盟在东胜举行会考，城厢小学名列前茅，总分得了第一。这样一来，轰动全盟，名气也就大了，学生来源打破东胜界线，郡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包头等地的初小毕业生紛紛前来报考城厢小学，学生猛增到一百七十多人。

一九四一年城厢小学送走了第一屆高小毕业生，共十六名。年龄大的在社会上参加了工作，年龄小的都去陕坝三道桥国立绥远中学继续深造，所去学生全部被录取，如李华、杨广材、王怀智、苏汉章、任继才等。一九四二年这个学校又送走了第二屆高小毕业生，三十人左右。毕业生分别报考了国立绥中和国立伊盟

中学(伊旗再生庙)。就在这一年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进驻东胜，专员公署和县政府为了使这所学校为上层服务，便于他们的子女入学，将城厢小学搬迁到东胜城内，校名未改。原校财产交给杨七寨子，另办一所完全小学，罕台庙改为初小。当年城厢小学搬在城内警备司令部隔壁院内——西营房(今市财政局院内)，原校长李廷辅调任县民教馆馆长，县政府又新委任该校六年级班主任马述曾为城厢小学第二任校长；任命李先唐为杨七寨子小学校长，配备了五六名教员，学生发展到七十多人；任命柴儒为罕台庙初级小学校长，配备教员二名，学生有五十多人。

城厢小学和军队混在一起影响教学。一九四三年县政府拨经费在城内东北拐角(今一完小)兴建了校舍。这年送走了第三班高小毕业生，共三十余人。除十余人报考了国立伊中

外，大部分失学。一九四四年送走了第四班高小毕业生，共三十余人，同年有十余人报考了国立伊中。

（三）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当时东胜县的县长是樊库，主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初级小学教育。当时东胜的主体学校已建立，东部地区有城厢小学，西部地区有杨七寨子小学，学校布局也比较合理。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解放前东胜教育事业的极盛时期。这年城厢小学校长马述曾因贪污被学生告发，从桃力民调来刘子敬任命为该校第三任校长；杨七寨子小学改为和睦乡中心小学（高小）；罕台庙小学改为孝友乡中心小学（初小）。忠恕乡中心小学（初小）校址设在郝兆套，校长是宋丕悟；仁乐乡中心小学（初小），校址在皂火壕的边家塔，

校长是奥风华；爱民乡中心小学（高小），校址在忽羊兔寨子，校长是陈步云；信义乡中心小学（初小），校址在十股壕，校长是祁治华；平定乡中心小学（初小）校址在今伊旗特并庙，校长是杜锦；礼让乡中心小学（初小），校址在今伊旗花亥兔，校长是鲁显文；智廉乡中心小学校长是王昕。

乡一级的中心小学除任命校长外，初小配备二名教员，高小配备六至七名教员，在校学生一般每校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名左右。

根据学校的布局，便于学生就地入学，以保或联保建立了保国民小学，这类学校均是单人班，在校学生每校一般在十至三十人左右。全县各类学校共有教师五十名左右，在校学生七百至八百人左右。

一九四五年，绥远省立河西师范建成，结束了东胜地区没有中等学校的历史。校址设在

东门外大礼堂，校长由公署专员陈国祯兼，除请了部分专职教师外，不足部分是专署及县政府的官员兼课，至此，东胜历届高小毕业生的去向，大部分投考了这所师范，为东胜培养了一些人才。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送走两个毕业班，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东胜时迁往包头，建国后改为包头师范。

一九四七年，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全省范围内大办省立小学，东胜也不例外，但他们不是拿出经费兴建校舍，发展教育事业，而是派一个校长及几名教员接办原来地方办起的学校，如城厢小学被他们改为“省立东胜小学”，校长王金铃，教导主任边崢山，还配备了七八名教员。这所学校寿命不长，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东胜时关闭。就在这年后半，李直哉回到东胜，将这所小学改名为“东胜县第一完全小学”，他任校长并聘请了六七个教

员，复了课。

一九四六年将杨七寨子小学校长李先唐调回县当了专职参议长后，由该校教员张仲臻继任了校长。

(四)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东胜的人口有所增加，情况也比过去复杂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对推动东胜的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流亡人员和过往军队太多，兵慌马乱，苛捐杂税，致使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越来越贫困。随着形势的变化教育事业也是起伏不平，不能巩固下来，唯一巩固下来的学校只有城厢小学和杨七寨子小学。在这两所学校受过启蒙教育的学生，为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还有十余人，如杨广材（江西）、苏汉章（东胜）、李华（包头）、张存礼（甘肃）、刘金山（甘

肃)、奥风贵(武汉)、王怀智(甘肃)王怀刚(杭锦旗)、李英(民族师范)、刘茂功(盟沙研所)、白永厚(盟沙研所),他们有的是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是国家干部。至于高小以上程度的毕业生不计其数,不仅在东胜各行各业都有,而且可以这样说,遍布东胜各个角落。

东胜地区民间文化活动

王文光 刘继祖

解放前，东胜县的文化生活是相当贫乏的。县政府官方没有一点文化艺术机构和文化艺术设施，只是老百姓自发地组织一些文娱活动。这些活动都带有一定的迷信宗教色彩，如庙戏、喇嘛庙会、跳鬼和社火等。

庙戏，也就是庙会。老百姓为求神下雨盖的龙王庙、关老爷庙和为免灾疫盖的全神庙和大仙庙等，这种庙，有的是有钱的地主一家盖的，有的是由若干牛犴户自发组织起来，按牛犴分摊出钱盖的。庙会，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间请来戏班给庙神唱戏，为的是让神在天显灵，风调雨顺，时来运转。这种戏一般唱三到四天。这几天老百姓穿上最好的衣裳，带着自

己生产的一点农副产品，扶老携幼，前来赶会，是一次文化娱乐会，也是一次物资交流会。东胜县的庙会唱戏的有碾盘梁庙、马莲圪卜庙、罕台隆胜兴庙和桃力庙等。庙会的时间有的是古历五月二十五日起，有的是在七月、十月，日子一般是固定的，有时也因东西凑不起等原因提前或推后。请的戏班都是私人戏班。这些私人戏班主要是陈玉锁、陈有才父子领的戏班。有时也请河曲、府谷、准旗的一些戏班，如张金花、杨兰兰、吕三、马鸡换等戏班。陈玉锁于一九三九年从大同来到东胜，组织起一个戏班，这是东胜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戏班。主要班主除了陈玉锁、陈有才以外，还有孟凡人、苏红洞、张三、郝财富等人，演员通常有二十人左右，多时可增加到三十人，少时减到十凡人。他们演的都是古装戏，如《访白袍》、《下河东》、

《天门阵》、《金水桥》、《明公断》、《教子》等，也唱一些不太健康的戏，如《杀子报》、《狐狸园》、《换花》等。他们的服装道具比较简单陈旧，演员的年龄也比较大，而且多数有抽鸦片烟的习惯，生活比较穷困，还常常受官僚、土匪的压迫骚扰。他们夏秋唱戏，冬天没事干，就当鼓匠讨吃，遇到人们有婚丧之事请他们去演奏，也能得到一点报酬。这种演奏乐器有唢呐、锣鼓等，是一种简单的民乐合奏。分别婚丧之事，演奏不同的曲调

喇嘛庙会：东胜县境内有不少的喇嘛庙，如桃力庙、罕台庙、赫拉不拉庙、吉乐庆庙、山炭庙、板什台庙、巴彦特老亥庙、莫儿古庆庙、阿不亥庙等。这些喇嘛庙每年都有会，时间多数是在古历的七月，也有的在九月，时间多为三天，大一点的庙七天、十天以上。会

前，喇嘛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作准备，念几天经，然后正式开始，举行民间舞蹈，人们叫“跳鬼”。这种舞蹈由锣鼓、唢呐和唢（一种长则三五米短则一二米类似长号的乐器）组成的乐队伴奏，跳舞的人头带牛、马、羊、鹿、鬼、神等面具，身穿长花袍。这是蒙古民族的一种民间舞蹈。在庙会期间不仅跳舞，有时还请戏班唱戏，同时进行物资交流，蒙汉老乡从四面八方赶来，交流牲畜和农副产品，观看文艺节目，是非常热闹的盛会。

社火：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在正月期间，特别是正月十五前后，由若干个牛犊户组成社，由社里推举的会首按牛犊分摊为闹红火所需要的吃喝费用。这种社火在当时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群众自己组织的高跷、秧歌、旱船等传统文娱活动，走乡串户，家家户户堆上旺火，张灯结彩，鸣放爆竹，这种活动在东胜县

城乡都举办。第二种形式是“灯遊会”。凡是大一点的庙都举办，时间多数是在正月的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晚上，也有的在古历二月初一到初三、初七到初九、十四到十六的晚上。先在庙前拢起三百六十个小土堆，大约有二亩面积，小土堆上点上用面捏的小油灯，用纸糊个灯罩，人们叫它是“九曲黄河阵”，里边有一定的路线，能进能出，不会的容易走错，找不到出处。举行灯遊会的晚上，人们成羣结队从四面八方赶到里边转转，叫做转“灯遊会”。转“灯遊会”的人多则一两千以上，少则几百几十，老乡们认为进去转转一年通顺，免除灾疫；夫妻不和，进去转转能够和好；不生孩子的妇女进去转转，偷上一个灯，就能生下小孩，生下小孩后再把灯还给；有冤仇的人相跟上进去转转，能解仇和好。这种“灯遊会”虽带有迷信色彩，却是民间的一种集体游

戏娱乐活动。碾盘梁庙、马莲圪卜庙、铜匠庙和石家梁庙都办过。第三种形式是玩艺班子，就是由一些爱好玩艺的人自发组成一个班子，演出民间戏曲——“二人台”。演出节目有：《走西口》、《打金钱》、《五哥放羊》、《梁山伯与祝英台》、《送四门》、《探病》等等，也有一些不健康的节目，如《听房》、《吃醋》、《害娃娃》、《十八摸》，总共节目约有一百来个。东胜县当时比较出名一点的玩艺班子有东胜附近的杜九拴、杨板等人，他们能演一百二十多个节目，每年从正月初六开始演到月底，有时一直演到古历二月底，由社里按牛犊收起吃喝费用，管饭不给钱。他们平时参加劳动，只是在春节期间组织起来，是自发的民间业余文艺组织。解放前夕，有几年杜九拴和杨板等人进后套（五原、临河一带），整年给人家闹红火，人家付

给一定的报酬。东胜县的二人台小戏曲传入较早。早在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间，从托县一带带来了个叫张小辫的艺人，带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玩艺儿班子，来东胜演唱过。后来在宣统初年，杜九拴、杨板、王良虎、屈须狮、屈拴狮五人到后套五原一带拜艺人何三旦和高林（他们两人原是托县人）为师，学习了不少节目。他们从后套回来后，就在东胜传开了这种二人台小戏曲，他们五人是东胜县二人台小戏曲的创始人。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当时绥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干部王小庄、刘一山等人，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组织了一个“沙漠剧团”，演的节目主要是话剧，象《打城皇》、《割麦忙》、还有活报剧，配合时事演《捉汉奸》等。刘一山还把罕台庙城厢小学的学生组成大

型的合唱队，演唱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流亡四部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等。每逢庙会或唱社戏的集会，剧团就出动演出，活跃了当地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一九四〇年春节前，当时中央抗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领导的第四厅的电影工作者来陕北拍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外景，从榆林来东胜搞慰问演出，东胜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电影。共演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台儿庄大血战》，一部是《重庆防空大演习》，都是无声电影，解说词是外加的，既开了东胜人的眼界，又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斗志。一九四二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傅作义在绥远省从上到下搞清党运动，东胜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也就被遏止了。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春节，东胜街

头群众自发组织过两次红火，有高跷、旱船、狮子、秧歌等传统文艺节目。

流传在民间的其它文艺形式，除了上面介绍的以外，还有民歌、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狐狸精等）、刺绣、剪纸，等等。这里值得介绍一下的是当地的民歌，就是“爬山曲”，流传在东胜的民歌曲调，大体上与流传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曲调相似，有“二人台调”、“蛮汉调”、“赶牛车调”、“二流水调”等。这些“爬山曲”特别为当地农民喜闻乐见，差不多男女老少人人会唱。而那些长工、车倌、羊倌和那些婚姻上不如意的妇女，往往是“爬山曲”的创作者和歌手，他们通过唱民歌来表达内心的痛苦与愿望。例如反映受苦人的痛苦有：“黑老娃飞在红柳滩，思谋一下揽长工好心惨”，“手赶牛车怀抱鞭，又冻又饿谁可怜”，“苦苗苗结的苦瓜瓜，苦妈妈

生下我这苦娃娃”。憎恨地主的有：“云里的日头洞里的风，蝎子的尾巴财主的心”。反映封建买卖婚姻的有：“山倒崖塌百灵灵飞，天搅人恨活分离”。

东胜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

边眉山

解放前的东胜，医疗卫生事业落后，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被疾病夺走。

伤寒病、出水病漫延东胜各个角落，有整村整户的人家全年卧床不起。民国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一年，本县境内的武家圪堵（今罕台庙乡）、倪家梁（今特拉壕乡）、西问家湾（今罕台庙乡）发生了鼠疫病，当地人叫“传头子病”这种病传染之快、死亡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如武家圪堵郭老虎一家四口人一天一夜全部丧生。西问家湾有个叫高三锄的一户人家死了二十多口人，只留下一个年仅十四岁的高三锄。听人们说这个孩子长象很丑，皮肤也粗糙，虱子、跳蚤从来不咬他。家里人死了以

后他无处安生，孤独一个人日夜和这些死人做伴。周围亲友，不忍心让这个孩子饿死，但又不敢到他家看望，邻居每天把饭送在他家的对面山头上，然后叫应高三锄，送饭的人马上离开山头。高三锄上山吃了饭，再乖乖地回了家。日子久了传染病也停了，高三锄的性命在乡亲们 的照应了下保住，给高门留下一条根（这个人现在还活着）。这年东胜的鼠疫区共死了一百多口人。除此，风俗习惯乱的村庄花柳病也很严重（解放后中央派抗霉大队才根绝了这种病）。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全县没有一所医院，只是农村有个别民间医生。大量的是神汉、巫婆、阴阳。老百姓为了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神、问卦，有的请阴阳先生“谢土”。用迷信的办法治疗疾病，其结果是花了钱，送了命，弄得人财两空。在镇内，只有三家药铺，

即：张氏三弟兄在西街开的“益源堂”，张应奎在北街开的“自昌成”，彭文义也在北街开了一个小药铺，他们三家一边卖药一边开诊所。

抗日战争时期，东胜地区还来过一个驻军医院，叫“八三医院”。院址在羊场壕张进财圪堵。这个医院是专为抗日受伤将士医治的专业医院。抗战胜利后这个医院撤走了。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行政院卫生署伊克昭盟卫生所由扎萨克旗新街镇迁到东胜，地址在今宾馆楼后院。第一任所长叫赵纯喜，第二任所长叫陈文擅，大夫是武治基，卫生员是樊耀清、乔殿清，还有一名会计，一名勤杂，共六个人。卫生所设备简陋，没有多少张床位。

有些民间医生如西部区的陈怀文、北部区的刘黄榆、刘宏令、段锦裕、韩秀峯、邓四毛仁，东部区的金巴喇嘛、李四玉、李假女等，

他们继承了中蒙医的传统医疗技术，为东胜地区广大劳动人民医治疾病。

一九四五年，在东胜建立了一个“驻东胜巡回医疗队”，实际上不巡也不迴，只是为专署的少数人服务。医疗队的地址在南街和平巷王占清院内。第一任队长叫胡文光，第二任队长叫邱世祥，卫生员是刘海峯、袁廷佑，连同会计、勤杂不过六七个人。崔桓当了队长之后把医疗队迁到包头。

东胜县工商业概况

李先唐

明朝中期，内蒙古处于封建割据，明王朝的势力逐步退出，后被蒙古达延汗所统一。这一时期蒙古各部曾和明朝在边境设点互市。蒙古人用马匹畜产品换明朝的绸缎布匹、茶叶等日用品。当时伊盟牧区的蒙古人到指定的河曲、神木、榆林等明的边境城镇进行互市，汉族商人不能到蒙古地区交易，蒙古人也没有直接经营商业的，谈不上有什么商业活动。

清朝时期内蒙古被满州贵族征服，隶属于清廷的直接统治之下。边商开始在牧区草原上活动，对蒙汉劳动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高利盘剥。如一合火柴能换一斤羊毛，一双蒙古鞋能换一匹马，一个鼻烟壶能换一只羊，一块砖

茶換三十六斤羊毛，一件蒙古長袍換六十多斤羊毛，五十個餅子換一只羊，五匹斜文布換一头牛，一匹市布換十五斤山羊絨。利大招遠客，河北、山西、陝西等地的邊商紛紛來伊盟地區巧取豪奪發了大財，給伊盟蒙漢人民留下的是生活上的貧困和落后。

清光緒三十年放地開墾后，東勝境內成了漢族聚居的地區。墾務賣地時，內地的有錢商人、地主出錢購買土地，這些獲得土地的商人陸續在東勝境內開設字號兼營商業。如東勝東部就出現了王全經營的“豐盛西”，李明在皂火壕開設的“玉成泉”，張生口開設的“廣生成”，郡王旗的東官府爾定格利與漢族商合夥經營的“古瑞生”，還有府谷商人在卡錢溝設立的“全和長”以及在罕台東西設立的“全和公”、“隆盛興”、“九成功”、“恆元成”等字號。東勝西部有神木商人開設的“萬

盛魁”与“广成永”等字号。这些字号既经营土地进行出租剥削，又推销茶、布、水烟、糖等日用品，不等价的换取东胜的畜产品和农产品。但是民国四年以后，东胜境内土匪抢劫活动猖獗，不少商号因屡遭抢劫而破产。

东胜城关自清朝设厅以来，只有文武两个衙门。据说东胜刚设厅的时候，全城只有六个男人一个女人，这个妇女还是县官的老婆。其实并非如此，武衙门还有二十多个衙役，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人。民国初年东胜建县后，城内也只有县政府和警察局这两个机关。因为长期土匪变乱，县政府几遭土匪的焚烧，县政府长期不是设在包头就是设在忽羊兔的陶油坊办公。县政府还不敢在城内设立，而商人更不敢在城内设店铺。王文泉任东胜县长时，才重新建设东胜县的县城。随着土匪的肃清和社会的安定，到芦呈瑞任县长时，鼓励当时的地方大户到城内

建房，也招引外地的商人和小贩在城内开设小店铺。这样东胜城内就逐渐形成一条南北小街。当时高朗峯和董文斌合营的“广合文”就设在市内的正中心。南街的主要商号是曹元祥经营的“信义成”，主要经营酱醋。还有任沛开设的“德义公”，山西太谷人开的“聚义成”，苏红洞开的食品门市部。北街有张富绅开的“天义城”，王池开的“东顺成”，杨东波开的“大昌东”，魏吉和开的小杂货铺。东街有包头商人温成太开的“同德昌”，王兆麟开设的“万生园”饭馆。街中只有两家药铺，一家是张清源兄弟开设的“益源堂”和张应奎开设的“自昌成”。还有刘老太太和许荣贵两家饭馆。南街有刘兔开设的一处澡堂。抗日战争开始后，府谷的字号“玉兴德”也来东胜开设了一个“玉兴德”分店。“广合文”商号倒闭后，高郎峯约当地士绅结股，在“广合文”的旧址

办起一个消费合作社，先由姚建屏经营，后由白凤岐经营，解放前倒闭。抗日战争胜利后，只增添了两家商店就是武进才开的“德庆公”和康品三设立的“康氏大药房”。

抗日战争开始后，东胜县党政机关增多，缝纫业也从无到有。最早是由山西偏关来的李裁缝、武裁缝和王明的裁缝铺，后来又陆续来了两家，全城共有五架缝纫机的五家裁缝铺。随着东胜城人口的增加，服务行业也从无到有，神木来的刘根太开了个理发铺，董治全、刘克仁又开了两家肉铺，但是只能凑够肉数才能屠杀。另外范满家喜开了一座碾磨坊和一座豆腐坊。

解金武任东胜县长时，主张兴办东胜毛纺厂。他让崔宽则担任经理，从榆林买回一套毛纺工具，然后向东胜地方凡有羊的人家摊派羊毛，结果年年要羊毛，只织了少量毛布和毛绒

毯。原来说要给东胜人民解决穿衣问题，而实际上却肥了崔宽则等人，东胜建县以来办的第一个工业性的作坊终于夭折。

东胜县另一个商业性的小集镇“自生堡”（杨七寨子）的形成。抗日战争前后，河北保定、顺德等地的小商因羊羔皮出口价格高，纷纷来伊盟收购羔卷皮。这些小商都是肩挑身背小百杂货交换小羔皮，然后集中运到包头发到京津一带。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这些小商因家乡沦陷，共有七十多家小贩不能回家，就在杨七寨子聚居起来，形成东胜西部“自生堡”这个小集镇。史其昌任东胜县长时在“自生堡”设立贸易管理处，经管小商的经商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包头相继沦陷，伊盟境内的货源基本枯竭，日用百货奇缺，物价飞涨，每个银元只能买到一尺市布和二尺土

布，畜产品如皮张、绒毛根本没有人收购。有绒毛的人家就用绒毛纺毛线，织毛衣毛裤穿，有的甚至将毛擀成薄毡缝成衣服，能穿到布衣服的人家实为小康之家了。

东胜广大农村在建县初连手工加工业也是一穷二白的。刚开垦后，农村加工米面的碾坊磨坊也是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大户人家有碾磨，农民加工米面用碾磨还要打课，碾一石粮要二升米的课。至于食油加工那就更困难了。农民每年秋后收下的油料，起初都得运到府谷、哈拉寨去加工换油，使哈拉寨一下发展到十八道油梁，成为热闹一时的小集镇。后来东胜县的忽羊兔沟陶六儿盖了两座油坊，至此，东胜境内的大多数油籽都集中到陶油房换油或加工，“陶油房”就此得名，远近闻名，生意也十分兴隆。到民国二十二年以后，东胜东部的“丰盛西”“公瑞生”；补洞的刘万才、张六子，皂火壕

的“玉成泉”“广生成”，罕台的韩恩义、杨康焕、李飞雄都陆续开了油坊。东胜西部的崔宽则、杨文焕、阎三海、贺文富也开了油坊，油料加工业迅速发展。抗战前酿酒工业的缸坊也陆续出现，原料主要是糜子酿酒，如城内的苏红洞缸坊，是盛名一时的。但抗战开始后粮食奇缺，国民党多次下令查封缸坊不准流酒，刚刚出现的制酒手工业就被国民党扼杀了。

其它手工业如石、木、泥、铁、铜、银匠以及毡匠、皮匠，起初都是春来冬往很少定居，时间长了有的匠人成家立业定居下来，当地的人也有跟着学手艺的，逐渐产生了一代新的工匠。农村手工业工匠都是个体经营，走乡串户给农民加工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赚取加工费维持生活。

集市贸易活动主要通过给龙王谷唱社戏和喇嘛庙会进行交易。每年春天一开始戏班子就

来了，轮流在各地龙王庙的戏台唱大戏，最少也要唱四天。东胜境内的喇嘛庙夏秋两季念经跳鬼搞庙会。新庙、哈拉不拉庙、吉乐庆庙、鸡庙、阿不亥庙会期只是一天。罕台庙、桃力庙会期少则七天多达半个月。每到社戏、庙会的时候，东胜坐地的商号都成立了流动帐篷在会上开市交易。外地的榆林、神木、府谷、保德、河曲及包头的大小商人也来赶会做买卖。在集会期间农民将自己的农副畜产品出售，购买自己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或生产资料。

其它方面的交易如食用盐碱都产于杭锦、鄂托克两旗。每年秋冬两季，蒙古牧民将盐碱由产地运至东胜西塔特沟的盐碱坊，汉人用银元或糜子换取盐碱。传说最初进行交换时不用衡器和量器，用门板量糜子和盐碱，一门板糜子换一门板盐碱。后来有些汉商把持了盐碱坊从中鱼利，才改变了这种原始交易方式。另外

神木、榆林、府谷农民每年夏秋把自己产的水果或瓷器碗碟，用驴馱车拉来东胜农村换食盐或食油。这种交换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商品交换，交易额并不大。

一九八二年七月

苛捐杂税与徭役

李廷辅 李先唐 李飞雄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开垦放地后，清政府在羊场壕设东胜厅，这是与旗并存的行政机构。开始对东胜老百姓征收的主要赋税是地丁银。这项赋税依据公元一七一二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基数，以后增加人口，不再加税。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地丁银。东胜厅沿用地丁银来征收垦区居民的土地税。征收的标准是按放地时的土地价银两，百分之十的税率交纳地丁银。凡有地的人都要交纳地丁银，没有土地的佃户和佃农不交地丁银，但要给地主交纳二八或三七的佃租。东胜是新开的垦区。清政府为

照顾蒙古族王公不因放地减少财政收入，仍然允许蒙古族王公每年收四成地丁银，东胜厅只收六成地丁银上繳清政府，清朝时，东胜地区人民的主要负担是地丁银，额外赋税虽有，但数量不多。如在建立东胜厅的时候，设立了文武两个衙门，衙门里有少量的官吏和兵丁，这些官吏兵丁的吃粮、骑马草料和燃料需向农民摊派，但数量很少。

建县后把地丁银改为岁租，即国课。征收岁租的对象是还有土地的农户，没有土地的人仍不出岁租。岁租的征收仍维持四成交蒙古族王公，六成交东胜县政府的原则。但是岁租的征收以银两数为依据，改为交纳银元，每枚银元重量是七钱二分，交岁租时每枚银元只抵岁租银两的四钱一分四厘。这样岁租银的负担就比过去的地丁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另外，建县以来其它捐税也逐渐增多。农民猪羊

屠宰也有了割头税，每头猪征割头税五角银元，每只羊一角银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前东胜大种鸦片，于是烟土税成了东胜县政府的主要收入，同时烟土税也成为县区官吏中饱私囊的主要来源。此外，建县后，县级官吏逐渐增多，同时还建立了区乡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比如县里有公安局，各区设保安队，这些维持统治秩序的武装人员的吃粮，马的草料，当然都由东胜人民负担。当时，每个区都养二三十个保安兵丁，保安队的一切费用都落在当地人民头上。每个农户除分摊保安队的吃粮，马草马料外，还在岁租银中每两加摊一角银元作为保董兵丁的补贴。除以上捐税外，农区的牲畜到蒙旗的羊场放牧要按头数交捐水草税。蒙旗的交通要道还设关卡，凡拉牲口通过的交过路水草税。

抗日战争开始后，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真是纳不完的粮，数不清的税，应不完的各种差事。下面把抗日战争以后东胜人民的各种负担分述如下：

1、东胜县设立田赋粮食管理处，把岁租交银元改为交实物。因为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不能保证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便规定每两岁租银交租粮一石。这种田赋粮不仅有地的人要出，佃户也要按交租的三七、二八分成交纳田赋粮。

2、增加军粮。国民党借抗日为名扩大军队。东胜的驻军也越来越多。东胜老百姓除交纳田赋粮，还增加了军粮征收的负担。军粮又分为两项：一项是统计粮，数量最大。名义上是按每家农户总产量纳统计粮，实际上征收数远远超过每户的总产。另一项是马料。每石马料还要加三百斤马草。每个区都设立粮站，每到秋天，县乡官吏、保甲长纷纷出动，

绳捆棒打逼着老百姓交粮。

3、一九四三年县长樊库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县公教粮和乡公教粮两种，作为地方行政人员和教育经费。凡是地方行政人员和学校的教员的薪水都以小麦为标准计算。把小麦折成粗粮分摊到农户。那些吃公教粮的人员每月或每季拿上县乡摊派的条子，挨门逐户上门要，不给不走。当时群众说：“公教粮，要命粮，上门逼粮无处藏”。

4、名目繁多的税捐。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借抗日之名，行对人民搜刮之实，各种苛杂捐税数不胜数，东胜也不例外。诸如印花税、烟酒税、行商税、地盘税……什么飞机捐、大炮捐、救灾捐……纷至沓来。还打着地方要建立所谓地方抗日武装的旗号向各甲要买枪买马的摊款。

5、向老百姓要修建材料，兴建县级机

关、干部训练班、及学校和乡公所。县政府将修建所需的木材按柁、檀、椽、棧的总数分摊各乡，然后派警察到各乡催要。警察所到之处不是伐木就是砍树，对百姓给老人准备的棺材板更不放过。这样，加上过往驻扎的军队修工事盖碉堡乱砍滥伐，东胜自开垦以来广大农民营造的林木到解放前基本砍伐殆尽。

6、繁重的差役负担。抗战开始后，东胜地区建立的军政机关，陆续驻扎的部队很多。而所有军政机关和部队的给养、武器的运送全加到有车牛的农户身上。按保甲所属农户轮流应差。一出去，时间少则二十天，多则二个月；地点近至河套、远至榆林直至宁夏，人畜死亡、无法统计。另外，还有应不完的短差。每个农户至少要一年一次、二次或三次应短差。主要任务是给国民党军政机关、学校拉烧炭送柴禾。除此以外修建大小机关的劳役负担也都在

农民身上。保甲长轮流派遣农民去做工。这个差事是不管农忙农闲的，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7、抓壮丁。抗日战争期间适龄男子都要进行三个月的国民兵训练。到解放战争开始，东胜曾连续三次抓壮丁，每次抓丁都是全县统一行动，抓回来的丁先投入监狱，然后再移交，逐步送入正规部队。因为当地人家居住分散，各蒙旗都不抓丁，适龄青年只要跑到蒙旗地盘就可幸免。因此，各家的年轻人经常不敢在家，而是到处流浪躲丁。

8、无名摊派。除上述各种捐税与徭役外，还有许多无名摊派。机关没的，老百姓有的什么都要，如扫地笤帚和吃的葱蒜也要。装东西的皮衬，口袋都要摊派，过年过节县乡官吏向老百姓摊肉要面，甚至吃粉条的山药粉面也向老百姓要。象县长樊库卸任走时，仅山药粉面就拉走七八车。

东胜地区早期农业生产与风俗民情

刘继祖

早期农业生产概述

东胜开垦前是鄂尔多斯牧场中水草丰茂的好牧场。塔拉壕、羊场壕、板素壕、柴登壕、宗兑壕、泊江海子什股壕等地尤甚。蒙古民族的大量牲畜游牧在这些草原上，真是白云高，绿草长，草原遍地是牛羊。

光绪年间垦务卖地，大量的汉人从神木、府谷移来垦荒种地，破坏了牧场，牧民被迫迁移。东胜的自然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失去了平衡，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沟壑越来越深，山梁越来越高。

新来的农户多半都是一面务农一面养畜半农半牧地方式生产。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农产品

出售不了，而畜产品却销路较好，所以当时一般有地的农民种粮食主要是用以解决口粮和牲畜饲料，耕地面积并不扩大，相当多的土地都留作牧场养畜。家家户户多以养牛羊为主，除养乘骑和使役的马匹外，很少养羣马，所以马匹数量不多，况且农田和牧场交错养马多有不便。

从农业生产来说，东胜一带农民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以糜子、荞麦为主。这两种作物生长期短，耕作管理要求不高，最适合无霜期短的这一带生长，糜子也就成了东胜地区蒙汉人民的主要食粮。开垦后的东胜农民每年计算丰产或欠收以糜子产量为标准，甚至在商品交换中糜子成了流通货币。如一个工给几升糜子，一匹布换几斗糜子，一匹马卖多少石糜子，就是吃一碗燉羊肉也用糜子做价钱，甚至红白喜事搭礼也送糜子。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人们逐渐开始种植谷子、荞麦、莜麦、豌豆、黑豆等杂

粮；蔬菜作物种的是山药、长白菜和蔓菁。后来也开始种植豆角、胡萝卜、葫芦、西瓜、茄子、辣角、元白菜、茴香、芹菜，种类也逐步繁多起来。

刚开垦的牧场土地肥沃，农作物的产量并不低，地里也不需要施肥，人们把牛羊粪大部分都当柴烧掉了。后来由于土地退化，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又重新记起“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的谚语。为了提高地力，农民不但不把牛羊粪当柴烧了，还注意沤制圈肥，农闲时也注意拾肥，在生产实践中尝到了肥多粮多的甜头。农民每年种植面积按肥料多少而定，一个时期扭转了广种薄收的做法。种糜谷的土地必须二年上一次粪，不上粪不种糜子，糜茬秋翻后第二年再种一年谷子。糜谷相互轮作，东胜东部地区糜谷种植面积各占一半，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民实行轮息制，在长草就长粮的思想

指导下，见有草的地就开荒种地，什么时间草也不长了，庄稼也就不种了。这种广种薄收的做法，使植被退化，土地沙化。

耕作技术起初也是相当落后。什么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更谈不到了。起初糜子只是锄一遍，荞麦不锄，田间管理比较粗糙。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认识到要想提高地力，增加粮食产量，必须精耕细作。因此，他们除注意施肥还注意到深耕秋翻，耕种前还注意耙磨保墒，凡是种的农作物至少锄两遍。农民下种后注意修建田头走水道，尽力减少水土流失。山坡地种上谷子锄二遍定苗，辛勤的农民给谷苗培上土，根部附近还给挖个坑，每逢雨后谷地里万星闪烁，别有一番景致。广大农民既注意保持水土，更注意与洪水斗争，保护田地特别是一些沟渠塔地边，农民打拦洪坝淤澄土地，在防洪堤岸上栽种沙柳、

雾柳柠条和树木，保田又保收。有些地方的农民对一些寸草不生的废地或低洼盐碱地也注意了改造。盐碱地分条开沟降低水位，掺沙子，加马粪，种耐碱性的作物。

因地制宜地发展水浇地。最初农民不仅在旱地里种粮食，就连白菜、蔓菁也在旱地种，东胜地区十年九旱，为了战胜旱灾，充分利用自然水源，人们开辟水浇地。没有自然水源的地方，人工打大井，安桔泉，发展水浇地。农民把水浇地当作保命田，有水利条件的多开，没有水利条件的少开，每户农民最少也要开辟一片水浇地种植蔬菜。

农民很注意保护牧场，即使是卖给自己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尽量经营自己的原耕地，很少随便开垦牧场种粮。农民懂得以牧促农以农养畜的路子是最正确的路子，好多自耕农自己养上四五十只羊、一对耕牛、一匹马，再加上

几头牧牛，正常年馐就能达到粮足草足还能出售一定的余粮，穿衣零用有出售的畜产品就足够用了，这可谓“小康”了。

东胜地区地下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开垦后很长时间人们不去开采，燃料主要是沙蒿和干粪，结果土地沙化、农田减产，严酷的现实教训了人们。为了增加肥料人们逐步改变着烧粪的习惯，同时促进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水头儿沟、酸刺沟和靠近东胜的罕台窑、高头窑等小煤窑。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拉足一年的烧炭，这是一次生产生活史上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对发展农牧业生产，保证大自然生态平衡是极为有利的。

风俗民情

东胜居民主要来自神木、府谷两地，生活习惯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如神木人好吃糜子窝窝头，府谷人好吃酸粥。府谷人吃饭

比较细致，神木人吃饭比较粗糙，但经过长期居住互相影响，最后终于形成了东胜人的生活习惯。东胜人的吃饭向来是简单的也是将就的，通常主食就是糜米、谷米两种，面食就是荞面、莜面和豆面，不种小麦当然就见不到白面。每逢过年过节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从包头或神木、府谷弄点白面，蒸馒头时总是要掺点假，外面包一层很薄的白面，里面包一大块米面，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吃的馒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引起外地人对东胜人的嘲弄。实际是生产和生活条件所限，并不是东胜人不喜欢吃全白面。在吃饭上东胜人也吸取了蒙古民族的不少吃法，如吃炒米、喝奶茶吃酥油糕圈就是学蒙古人的。东胜人吃肉的习惯基本和蒙古人一样，牛羊肉就喜欢大嫩手扒，切小了吃起来感到不过瘾。不同的就是汉人大量养猪，每到冬春季节盛行糜米捞饭猪肉烩酸白菜。

在穿戴上东胜人过去将就的多，讲究的少，山野草地人们也不兴时髦打扮。布匹少价格又贵自然而然受到限制。普遍的衣服是春夏不管男女老少都穿上布白布衫，老蓝布裤子，冬天做件棉袄棉裤，大人小孩都做羊皮袄。经常外出的人还做件皮裤。在蒙古民族衣着的影响下，有的汉人也做蒙古皮袍，也买蒙古靴穿，用一丈五尺长的市布或红绸做腰带束起来。多数汉人夏天头上蒙块羊肚手巾，冬天罩块大毛巾。脚上是自做的布鞋布袜子，很少穿线袜和市场卖的鞋。铺的盖的一般人家每人一床粗布被，一根白条毡，财主家也只是加铺一块二五马褥子，很少有铺布褥子的。

开垦后的东胜因没有树木，木材奇缺，居住条件是很差。只是从口里迁来的富户把椽檀从那里运来盖座土房就算差不多的人家，一般的人家都打土窑住。后来虽然种植树木成材能

用了，但是当地土匪横行，兵慌马乱人们都不敢修房子住。远处看不到人家，只有看到炊烟才知山沟里有人家。有时人们走到窑顶上才发现有人家。

那时交通也很不方便。马骡驴和二饼子车是东胜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没有牲口的人家不管多远的路就靠两条腿步行。东胜人过去不管男女老少都有骑乘本领，就是小脚女人有的还是很好的骑手。大型运载工具就是木制二饼子车，有骡马拉的，也有牛拉的，路远路近运送东西全靠这个运输工具。

东胜人的人情好。这是由于绝大部分人是生活所迫，离乡背井的弟兄。过往东胜的人可不用拿盘缠，有人家就能住，住下了就有饭吃，尽管那时东胜地区旅店很少，但过路人吃住还是很方便的。从内城来的讨吃要饭的穷人，当地人是很慷慨的，要一次，不是一升米，就是

一碗米。

尽管小农经济是自私的，但是东胜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还是团结的，互助互济的。比如在土匪变乱中，村里农民总是互通情报，一起转移一起隐蔽，共同防备土匪的捉拿。有时来“队伍”要吃要喝，总是全村给凑米、面、油、肉和马草马料共同应付，不愿把这些额外负担加在一家人的身上。同时农民还通过农村的旧俗把一个村的农户组成社，推选入社的主事人，村里有什么事就和主事人商议，彼此有什么纠纷也找主事人说理调解。另外，农村过去男人女人还有一种结盟活动，男子结盟拜兄弟，女人结盟拜姐妹，誓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烧香磕头就算结盟。这种现象在农村是普遍的，这里的人们团结互助，这种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东胜人最明显的弱点就是保守，乡土观念

浓，外地人常笑话东胜人出门看不到自己的烟囱就要想家。所以东胜人不论出外求学的或被抓了当兵的，回来的多，外出的少。就拿改进生产技术来说，只相信自己的祖传不相信科学，习惯势力非常厉害，不相信人定胜天只相信靠天吃饭，这是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最大的阻力。无知就愚昧，迷信思想迷信活动，旧社会的东胜是非常盛行，动一动土要敬土神，养牲畜敬圈神，还敬牛王菩萨、马王爷，场面敬场神，河沟敬河神，家中供奉财神、灶神，神权思想统治人们。

过去东胜人在生活习惯上有两大乱：一是赌博成风，职业赌棍特别多，凡是大小庙会或唱社戏官家为收地盘税大放赌博，平时在乡村里押宝抹纸牌，打麻将当作娱乐活动；另一个是风俗乱，男子把嫖女人既不当作耻辱，反而引以为荣，谁嫖的多谁是有本事的人，女人也把打伙

讨交朋友当作风雨人情。弄的梅毒泛滥，花柳病到处流行。

开垦后大烟毒品在东胜提倡种植，毒品泛滥成灾，好多男人女人抽上大烟都变成精神萎靡身体孱弱的“活死人”。有的人染上大烟瘾抽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弄的家破人亡。鸦片种植在民国二十七年马定国任县长时下令禁止，但只是不种而已。抽的还继续抽，烫的还继续烫，抗日时期沦陷区的烟土大量流来伊盟，日本人制的料面也在东胜贩卖，这种东西毒最大、瘾最深。直到解放后才把这一祸害彻底铲除了。

东胜人在过去卫生习惯很不好，拿饮水来说自然水源好的地方，人们连个井都不修，就在河滩水泉附近挖个水坑，人畜共饮。个人卫生就拿洗脸这件小事来说，绝大部分人一月剃一次头洗一次脸，平时根本不洗脸，不洗

手，只是做饭的主妇在饭前洗洗手，满面污垢，手脚乌黑。身上和家中的毡被寄生虫多，虱子、跳蚤、臭虫家家户户都有，人人好象咬惯了不以为然，外人一进门就能沾光赠几个寄生虫。由于长期不注意讲卫生，加上旧社会缺医少药疾病漫延，象小儿天花病、麻疹病每年流行，不知多少幼儿夭折于这种疾病。一九四一年冬天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流行过一次鼠疫病，传染的特别快，死了不少的人。国民党政府不进行防疫抢救，哪个地方发生疫情实行封锁，不许人们进出，捉住不听话的人不进行检疫，而是活活扔到火里烧死。一九四四年以后当地流行回归热、伤寒病还有痢疾病，由于缺医少药患者拿命抗，死活听天由命，死亡特别严重。

东胜县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

李飞雄 李廷辅 李先唐 杨霖山 王怀礼

(一)

清朝前期，东胜县境内纯属牧区，完全是蒙古民族游牧散居的地方。四台、五台、六台，每台是五十户蒙古人，大约一百五十户。其余地区东从古城壕起西到罕台庙大约散居五十多户，总共约二百多户。每户按四口人计算，约八百多口人。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垦务放地后，牧场被开，耕地逐渐扩大，草场日渐缩小退化。从事游牧的蒙古人被迫赶上牲畜向伊旗、杭旗、鄂旗牧区迁移。剩下没有走的蒙古人大部是王公贵族的亲属，垦务卖地时都给留了户口地。到解放前定居下来的蒙古人全县共有十四户，每户按四

口人估计，大约只有五十六口。

开垦后由于蒙汉两族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蒙汉两族有过一个时期彼此隔阂和冲突，蒙古人为了保护牧场反对开垦自发地搞过独贵龙运动。但对待进来的汉人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斗争，只不过是在汉人耕地的时候蒙古人拦牛犊，或者晚上把耕地的犁耩农具毁坏掉。蒙古人当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草场被迫开垦严重影响着牧民的生产和生活。

从历史上来看，尽管蒙汉之间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时候，但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是蒙汉兄弟关系的主流。

过去蒙古人有地不会种，象四台、五台、六台留下的蒙古人实行蒙汉变工，汉人给蒙古人代耕土地和种、管、收，蒙人给汉人代放马牛羊。其它地区留下的蒙古人不会耕种，邻近的汉人主动帮助，给蒙古人教耕、种、锄、收

的农业生产技术。由于长期互相接触，彼此了解，感情也逐渐融洽。如开垦后每年春季汉人缺耕畜，邻近牧区的蒙古人主动的把耕牛借给或租给汉人使用。农区遇上遭灾，牲畜饲草、饲料缺乏，邻近的牧区蒙古人也允许汉人到他们的草场去放牧牲畜。随着生产上的联系，经济上的交往也越来越多。蒙古人每年用牲畜皮毛和汉人换糜子、烧酒、食油，汉人所食用的盐基本上全由蒙古人供给，蒙古人日常食用的糜子全靠汉人。在经济上的互相渗透，生产上的互相支持，生活上的互相往来，奠定了蒙汉两族人民团结的基础。

东胜地区的蒙汉两族人民还能互相尊重彼此间的风俗习惯，所以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如蒙古人最讲究保护村宅附近的植被、“麻尼红杆子”，来的人只能走外面，不能从麻尼红杆子里面走，拿的马鞭子不能进家。

汉人家中有丧事一百天不能进蒙古人的家。这些蒙古人的风习，汉人多能遵守。蒙古人到了汉人家，汉人都能按照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进行招待。另外蒙古人比汉人讲究卫生，居住的房屋、院落和饮水用的井特别注意干净。在生活习惯上蒙汉人民也互相学习，汉人学蒙古人吃炒米、糕圈圈、奶酪、酥油，蒙古人也学习汉人吃饺子、烩菜、喝黄米酒。衣着上蒙古人学穿汉人的短衣裳、鞋袜，汉人也学蒙古人穿蒙古袍、戴蒙古帽。

蒙汉两族人民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东胜地区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伊旗、鄂旗、乌审旗的蒙古人保护了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和管押，汉人挺身而出帮助营救。如蒙族青年石柱于（郡王旗人），因汉奸嫌疑被二十二军扣捕，在送往榆林路过东胜时，高朗峯等人向左

协中进行过多次交涉，免遭不白之冤。从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是土匪猖獗活动的时期，蒙汉两族人民在反抗土匪的斗争中联合行动，进行长期不懈的抵抗。如准旗纳森达资的兵官毛肯和东区保董贾海树互相配合阻挡了土匪的进犯。西区台站区团总杨金柱、杨绵羔曾和郡王旗苏泊汗神枪手色登淖布（王爷的女婿）协力，多次打走了进犯的土匪，消灭了匪首郝树林。蒙汉两族人民在剿灭土匪的斗争中结下了深情厚谊，长期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二）

元朝时西藏喇嘛教传到了蒙古地区。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主持元朝中央政府宣政院在蒙族地区修建喇嘛庙，鼓励蒙古人信佛教当喇嘛。清朝时期满洲贵族为欺骗蒙古人大兴寺庙，提倡喇嘛教，蒙古人兄弟只留一个黑人，

其余都当喇嘛。因为当了喇嘛，庙上给留户口地，还免除一切负担，所以东胜境内的喇嘛庙大部是在清朝康熙、乾隆、雍正期间先后修建的。开垦后蒙古牧民大都移走，只有喇嘛全部保留下来。东胜境内从东到西的喇嘛庙有新庙、哈拉不拉庙、贾明庙、吉乐庆庙、阿不亥庙、罕台庙、桃力庙、木古庆庙、山探庙、鸡庙、板色太庙、不也特老亥庙、特并庙、小康巴庙等共十四座庙，据估计当时有喇嘛四百五十多人。喇嘛的主要任务是学经念经，从事宗教事务活动，平时也给蒙汉人民搞迷信活动，蒙汉人家人畜发生疫病也请喇嘛念经消灾免难。喇嘛的户口地和常署地都由移来的汉族农民佃耕，每年有的按三七分股子，有的按二八分股子，大部就地分实物地租。喇嘛对汉人佃户只分粮食油料，其它副食作物一般都不分，给喇嘛当佃农要比给汉族地主当佃农好

得多，起码在剥削上要轻得多。庙上的主权和宗教事务都归郡王旗管，养喇嘛的费用都落在汉族人民的身上。

东胜地区的汉族居民绝大部分都是由陕西省神木、府谷两县来的，在宗教信仰上都信仰佛教，农民结社普遍都盖龙王庙和观音庙，家中还供奉财神、土神、灶神、水神等。解放前在汉族人中兴建的佛寺只有两座：一是马达圪卜的大庙，一是东胜西部的碌轴庙，汉人出家当和尚、尼姑的除上本地的庙外，部分还送到神木的佛寺和姑姑庵为僧。汉人讲迷信许愿有的还专程到府谷的杨家峁和河曲的海潮庵去敬神还愿。当地因为喇嘛教盛行，每逢庙会大部分汉人也到喇嘛庙上敬神磕头，上布施，熬曼架。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也由包头传来东胜。当时宋家渠的柴仲明、陈二珠等人传播一贯道，但信仰的人不多，解放后被取缔了。

片段忆事

李廷辅

我原籍陕西神木县。幼时在家里读“四书”、“五经”。当时因神木县没有学校，于一九三〇年到包头马王庙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包头中学（绥远省立二中）。一九三四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绥远省举办的指导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托县任指导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东胜，参与东胜县政事，先后任过区长、督学、民教馆长、小学校长，县参议员等职。

现将我在东胜期间亲见亲闻的几个片段忆述如下：

1、火烧县衙门

北洋军阀期间，东胜地区土匪遍地。一九

一九二九年，东胜当时的县长武尔功、警务长赵龙潭，为了镇压土匪，将土匪头子白四柱、李水海、陈二板头搜捕扣回东胜，准备枪决。一部分流窜土匪听到消息，设法营救在押土匪。其中，另一个土匪头子马留保，勾结县衙门检长（警察班长）王国安等人，把警务长赵龙潭打死，放火烧掉县衙门。打开监狱，放走在押土匪。从此县衙门又搬回包头，这一带土匪活动更加猖獗。

这次火烧衙门烧毁了民国八年前（一九一九年）的全部档案，就连收岁租的红帐都烧了。以后通过绥远的帐簿及老百姓的地契又一家一户核对重新建起了红帐。

2、裴县长下台

裴跃祖任东胜县长时，小股土匪经常出没于东胜地区。原因就是县长不但不为民除害，反而与土匪相勾结。土匪头子、其侄儿裴国女及云

板头就住在他家。土匪受到官府的庇护，东胜的老百姓就更加遭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百姓高保林、燕有祥两人，于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二月，来到绥远都统衙门告状，可到六月底还不见音信。七月份，北区的村长李飞雄和老百姓代表王愚又到绥远和高保林等人接头，继续将呈状送到都统衙门。都统李培基接到呈状，认定，既是百姓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申诉，必是实情。就派李队长、乔朝海两人领一队省衙门警察来东胜，将裴县长捉拿绥远监禁。

3、王文泉建县城

东胜县城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王文泉任县长期间筹建，翌年建成的。

县城方圆四华里。城墙分别由四个区的百姓负担，即东城墙由东区的百姓负担完成，南城墙由南区的百姓负担完成，西城墙、北城墙

亦如是。办公室盖了一排砖平房，分为三个小院，东院公安局，中院县政府，西院法院。修建工人是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请来的。

据说建县城时绥远省曾拨款一万二千元银币，按规定应给老百姓合理的报酬，但是县长使用低价买成白土布，以高价计算发给老百姓的手段，鲸吞大批拨款，中饱私囊。

一九三二年，县政府从陶油坊迁到新址，当时县城内除县衙门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及为数不多的警察外，其他机构一无所有。到一九三四年，有一个刺头老曹，和警察局巡官张卿相，办了一个小饭馆。方圆四华里的县城，共有人口二百六十八人，由康品三任镇长。

4、打死卢县长

一九三五年，卢成瑞以参议员身份来东胜调查王文泉贪污一案。据说王县长贪污银元七口袋（牛皮红筒），这笔款一是从修建

县城经费中贪污的，一是搜刮的百姓的洋烟款。查清后将王文泉调出，卢出任县长。

一九三六年，薛家圪台有个名叫薛罗的人，在刘牛部下当兵，中途请假不干，回家后，勾结王润（神木人，原来也是刘牛的部下）以及本村的胡门东、胡红洞等人，打算另立山头。但因手无寸铁，便议定打县政府，抢武器，以便招兵买马。正巧这时，绥远省给县政府发来两箱（二十支）平三枪，还有手榴弹、冲锋枪。薛某等人对这些情报了如指掌。在一个晚上，他们偷窜进县政府，一看管枪的人不在，便将箱子弄开，每人先拿一支，出来察看动静。到卢县长家，发现卢县长家墙上还挂着一支荷子枪，为了拿到这支手枪，薛罗隔玻璃开了一枪，把卢县长打死，县长夫人见状，抱着男人就哭，他们又将县长夫人打死，还打死一个会计，一个勤务。警察

们听到枪声，跑出来维护，第一个刚扒上墙，便被薛某等人击中。其余也就再不敢动了。他们几个人拿到县长的手枪后，随即将禁闭打开，把十几个犯人全部放出，把剩下的新枪全部带上逃之夭夭。

刘牛知道这件事后回到东胜，派兵追拿薛某等人。县里也派四个区的区兵追击。直追到神木南乡，也没有结果，追兵看到无济于事，也就返回东胜。原来薛罗等人想投靠红军，红军王兆祥让其交枪，他们不干，王兆祥认为他们不是真心实意，就没有收留他们，不久薛某等人自动失散，不知下落。

5、马定国禁大烟

民国年间，东胜大种大烟。每亩出税八至十元，不少农民是得了一些利益，但吸大烟的人也越来越多。历任县长为了个人发财，任大烟泛滥。从不过问。

公元一九三九年，马定国出任县长，下了较大的决心禁烟，建立了禁烟委员会。当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下令：“发现哪里种大烟，先杀县长的头”。

省主席的指令，更加强了县长马定国的决心，他首先派指导员兼禁烟委员李廷辅等人，下各乡宣传禁烟令。然后县长亲自出动，一个乡一个乡地检查，发现小苗，用犁翻了改种良田；发现大苗，用木棒打倒，再改种庄稼。各乡乡长原来抱着观望态度，后来看到县长禁烟决心大，也主动检查本乡种大烟的情况，发现就铲除。自此以后，东胜农民种大烟的风气日趋衰减。

6、史县长烧瓷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史其昌在东胜任县长，在上以第三公署专员陈应道为后台，在下以一区区长王司中、四区区长武

建康为爪牙，大搞揖私、走私活动。东胜是陕北、榆林一带商人往包头走私的要道。主要是贩卖绒毛、皮张、大烟、素油等物资。从榆到包，从包到榆的商贩，一经东胜地区，即被史其昌的人手查获、没收，充为私有。为了销售这批物资，史县长用其弟齐铁铭（同父异母兄弟）为贩私的头子，在东胜建字号叫“大东昌”。没收的物资除本地销售外，还运往包头、陕坝等地销售。然后从包头贩上“洋布”，从陕坝贩上白面、粉条等运回东胜，牟取暴利。运输车辆则完全是捉老百姓的牛车当差，弄得百姓春不能种，秋不能收，民不聊生。

史其昌任县长时，罪行累累。他克扣教育经费、擅卖公产、纵兵殃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引起民愤。一九四一年城厢小学校长李廷辅等人联名控告史其昌，直告到绥远省政府。傅作义派专员调查属实，在东胜开厅审

理。经当堂辩论，在人证、物证面前，史只好认罪，当场被绑送绥远省政府关押。在押期间，史供出专员陈应道及下面的喽啰，省里决定：将陈应道调离，将王司中、武建康撤职。史交待清楚后，从宽处理了。不久史返回东胜。声言：“东胜百姓控告我刮了地皮，这次，我才要在东胜挖地三尺”。以后史其昌在东胜白泥渠开了窑窑，当了工头，确实挖地三尺了。

7、法办贾海峰

贾海峰在东胜当县长不到二年，在职期间，不顾百姓死活，走私贩私，大刮民脂民膏。大烟本是禁品，而贾海峰仗势大搞大烟生意。除此，他还从本地买上素油送往敌占区包头（日本占领），从中牟取暴利。贾的此等行径，被县党部书记长高朗峯（土生土长的东胜人），反映到绥远省政府。一九四三年，省政府派

人逮捕了贾海峯。贾带着手铐、脚镣，与东胜老百姓告别了。

8、税收（部分情况）

东胜的税收，从建县至实行田赋粮止，一直是向东胜县、郡王旗两方面交纳税租，即百分之六十交郡王旗；百分之四十交东胜县。按总地价的白银，每两交税一角。给蒙人交的部分不克扣（每块现洋实际重七钱二分）但给东胜交的部分，非克扣不可，一元现洋只给顶四钱一分四厘。

从民国初年起交纳办法是：统一交县，然后全县再按上述比例交付郡王旗。可是县里不守信用，总是不如数如期付给蒙人，影响到民族关系。一九二八年王文泉坐了县长，东官府尔定格利和王文泉协商，就交蒙部分由东官府直接收要达成了协议。

全县历年的税务，我们没有调查，只访问

了王文泉当县长时北区头牌担任过甲头的李飞雄。他说：“全县的数字我不掌握着，只能把我当北区头牌甲头时的税收介绍一下：北区头牌共有土地价值白银五千八百两，每年上交东胜县、郡王旗两方的岁程现洋五百八十元，县里再无其它苛捐杂税，但到区里又养活着区董、保董、区兵，他们的薪水得靠地方税收付给。因此以区再向下摊派税金。这部分地方税因各区土地面积、牲畜多少不一样，百姓的负担也就有区别了。北区头牌是：每两地价钱银子再抽税二分；一口猪屠宰税五毛；一只羊，屠宰税五分；养活一头大畜出税五毛。”

9、台站的来历

清朝时期，伊盟地区没有邮政，公文、信件无法传递。故设台站（驿站），够一程路，设一个站。送公文的人是一站倒一站，每个站设有掌盖一人，孔牖一人，达古二人，共四人，

专门办理往各旗转送文件事宜。每站有专马一匹，常备不懈，不得延误规定日期。

国民党保安十六团的始末

李静泉

保安十六团是东胜地区解放前夕的一支地主武装。一九四八年八月，东胜自卫团改编为保安十六团。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团覆没。连同自卫团一段时间算进去，也只不过一年多的光景。现就个人记忆所及，撰写出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团，以供参考，倘有出入，请知情者补正。

一、建团的由来

保安十六团，是在东胜县自卫队的基础上，由当时县长贾克让一手扶殖起来的，并自命为团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东胜县绥远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陈应道调离后，由陈国禎接任，他到任不久，就配合国民党东胜县党部书记康逸山立即掀起

了空前的反共高潮。以专员公署为首建立了什么每礼拜六的特种汇报制度，组成人员均系东胜城内党、政、军、特所有机关的首脑人物，也只有这些人才有出席会议的资格。每次会议，陈国祯是当然主持者。首先他听取一周之内各单位的活动情况和情报。（没有情报组织机关，只好把来往过路 and 道听途说的东西作为情报汇报）。汇报后经过一番议论，然后布置下周的活动内容。另外在每天城内各机关全体人员升降旗的朝会上，（这是由县党部主办的例会）规定了一项首长讲话，一般是县党部书记长康逸山讲话，也有时陈国祯出面讲话。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搞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蛊惑人心的宣传。

在农村加强了保甲长的培训和自卫队的组建工作。樊库任县长时，在东胜地区，筹建了

一个自卫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人。大队长由东胜县西区（现在的漫赖乡）莫古庆庙大地主王珍开担任。第一中队长李长在，第二中队长王明星，第三中队长何世明。一九四七年秋后樊库调走，由达拉特旗组训处处长贾克让继任。他上任不久，就与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张继雄、杨文煥来往频繁，关系极为密切。每逢张杨俩人进城，只要他知道，总短不了请到家里吃饭。他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些人收买成为自己能够支配的参议员。他根据解放军趋向东胜、新庙、古城壕一带（原东胜境内的东南角与神木、府谷毗连的一个乡，现划归伊金霍洛旗），行政工作已无法进展的形势，认为加强东胜县地方武装力量已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他建议：参议会写成提案，经过议员大会审议通过，提请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以防万一。在具体做法上，他

根据在达拉特旗组训处为了御防蒙人起来造反所组建两个自卫团的经验，认为东胜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招募一个团问题不会大。除原有的一个大队，仍由王珍开继续任大队长外，再增添二至三个大队，那就凑成一个团了。并指定张继雄、杨文煥出面筹办。同时对枪支马匹来源问题，采取免役的办法，用行政命令去推行，其办法是：凡有枪有马以枪为主加入自卫团者，一役律免。在此期间倘有人出来积极招募者，不论何人经验收够班编班、够分队编分队、够中队编中队、够大队编大队，招募者根据所编情况够什么官当什么官。贾克让的建议立即得到众伙的赞同。县参议会副议长陶世英要求承担招募一个大队，参议员杨文煥也愿承担招募一个大队，参议员张继雄表态准备给驻榆林二十二军的朋友写信购买库存枪支，就这样前呼后应自卫团的组建工作得到了落实，在全

县范围内展开了征集活动。

二、建团的经过

征集开始后，正值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变本加厉，日益增长，催粮、要款、拉差极为频繁，因而造成农民衣不遮体，食不裸腹的悲惨景象。当时农民最怕的就是“抓壮丁”，“家有一壮丁，昼夜不安宁”。当时百姓讲：“要粮要钱逼死人，抓壮丁兵活要命”。百姓听到自卫团买枪参加自卫团可免役之后，即走亲串户，奔走相告，买枪参加自卫团，有的人为了买枪倾家荡产，有的卖牛卖马，也有的典房卖地，投亲靠友，想方设法争取买枪，以便早日加入自卫团求得免役。一些有钱有势，想做官的狂热分子，更是到处奔走，呼朋唤友购买枪支，不管枪好枪坏，只要背在身上就算是一个有枪的兵。这样上呼下应，不到半年的时间发展为四百人马的一支武装部

队，名曰：“东胜县自卫团”。在当年（四七年）的年底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正式把王珍开编为第一大队，注册实有官兵二百名；杨文焕编为第二大队，注册实有官兵九十名；陶世英编为第三大队，注册实有官兵八十名；直属团部有一个警卫队，正副队长由辛开其、刘治芳分别担任。对外号称一个团，其实，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贾克让兼任团长，副团长张继雄，增设了一名团副处理来往公文，由东胜县参议会秘书李澄（李静泉）兼任。整训结束后，官兵解散回家。团部设在县参议会院内，并分别设立了大、中两级队部，其队部的地址都设在各大、中队长住宅所在地。同时规定团部留七人，大队留五人，中队留三人进行日常工作，每人每月供给粗粮三斗，作为一切费用。所规定的粗粮，都由团部

办理转发手续，按月拨到各大、中队，在粮站领取，此外再没有任何补贴。当时给予各队的任务是：1、作到上下通气；2、调动必须灵活。另外规定中队向大队部、大队部向团部每旬必须作一次书面报告，内容以情报为主。上述是十六团前身自卫团的组织过程。

一九四八年初春，由于准格尔旗防共实力薄弱，驻东胜县城伊盟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玉甲为了给准旗警备司令奇勇泉（也是陈的干儿）保镖，多次向上级请求增援部队，当时因为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派兵增援。陈玉甲利用自己的职权，就地发布命令，他命令东胜县自卫团星夜集合，指定张继雄任团长、陶世英任副团长。亲率全团增住准旗暖水，维护由东胜到神山（奇勇泉司令部所在地）运输线的任务。命令达拉特旗组训处康民众、王再成两个自卫团守护神山外围。组成准格尔旗临时防共司令

部，奇勇泉为司令，陈玉甲派他身旁的参谋长李子登为副司令。不久神山这个反共据点被解放军所拔，司令奇勇泉被俘，副司令李子登早已闻风而逃。驻在暖水的东胜自卫团与司令部相隔只不过十余华里，听到袭击司令部的枪声后，全团离开暖水撤回东胜城附近塔拉壕、敖包兔一带，团长张继雄、副团长杨文焕（顶陶世英的遗缺）进城向陈玉甲司令汇报军情，未测这位光杆司令（官兵共一百二、三十人的司令部）听后大发雷霆，杀气腾腾地立喊三声，把张继雄押下去，擅自撤离暖水据点，以军法从事。有些机关要员出面当日保释。他所以发这么大的脾气，原因是他的参谋长下落不明，烦躁得很。实际上这位参谋长也早已闻风而逃了。李子登在神山以北转了个大湾比张继雄迟了半天回到东胜。陈玉甲也再没有作任何纠缠，下令这个团负责东胜城防外围，打这以后这伙

人马再没有解散。

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正式收编为保安十六团，同时每人发给草绿色棉衣一套，发给全团十余箱步枪、子弹和六〇小炮两门。除第三大队长陶世英在暖水驻防时，因犯错误撤职，遗缺由大队付赵起盛继任外，其他基本上未动，军衔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团长上校、副团长中校、团副少校、大队长少校、大队副和中队长都是上尉、分队长中尉、文书少尉。新添陶立栋为少校军需主任、许子毅为上尉军需，贺聘珍为中尉书记，贾有明为上尉副官，魏凤山为中尉副官。并发给了徽章佩带在新发的草绿色棉衣上，看起来和正规军也差不多。官兵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没有副食。招待费、办公费层层吃些士兵空额维持。每匹马供给饲料粗粮三斤。这个团从印章上看隶属旧绥远省保安司令部，但上下一直没有通气。陈玉甲

的司令部未撤走之前就算唯一的上级。平时和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只有一般性的联系，彼此互不行文。经常听到的是团长贾克让的手谕和面谕。在一九四八年冬季，东胜地区大小十几个机关几乎全部撤走，只剩下保安十六团，担负城防任务，给县衙门保镖。张继雄为了补充实力，又通过私人关系向段宝珊买了十余支步枪，拿出自己一头走骡换回两挺轻机枪。这时全团也只不过能选拔一百四、五十名有枪有马的骑兵，官兵又都没有经过战斗训练，缺乏战斗力。只作些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活动。诸如半夜悄悄地开出城外，向北走上十余里，等到天亮时，一个大转弯再开进城里，谣传说从包头开来的援军，就这样折腾了一两次被群众识破了鬼把戏。后又改变了作法，把凡有枪有马以及有马无枪者都集合起来，不向北走了，而从东南方向出动，扬言袭击神府一带共军。最远的一

次开到现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的淖尔壕。这次活动只有大队以上的头头知道，因此在出发前弄了不少的笑话，有的公开请假，有的装病，有的开小差。

三、内部的分化

十六团内部的分化，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根源的。嚣张一时的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由攻变守，节节溃败。蒋介石固守东北的机械化装备的正规军全军覆灭，蒋介石身边的大将——杜聿明也被俘。东胜地区土生土长的韩增栋，由黄埔军校出来从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师长，在战场上也一命呜呼了。傅作义先生在北平起义。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头脑稍为清醒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的失败也不可逆转，人心惶惶，这是内部分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当地开明人士李直哉也在背后策动。

李直哉（是我的叔父）抗日战争前他在山西省太原市晋华卷烟厂当过经理，与王谦（那时是山西省的秘书长）关系比较好。山西省阎锡山撤退时，王谦把他介绍到薄专员（现在党中央的领导薄一波）那里工作，但尚未取得联系。据李直哉自己说，他曾经也加入过共产党，自从一九三五年旧绥远地下党组织刘子安夫妇在呼市被捕后，失掉组织关系。刘子安是陕西省府谷县人，他俩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同学，都是绥远省师范六年科第一班毕业。刘子安夫妇俩在“端午”后被捕的。在“端午”那一天我受叔父（李直哉）的委托给他俩送过两瓶酒、一斤“麻团”糕点。总的来说他对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懂得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解放前的一九四六年在皂火壕（现在板洞梁乡皂火壕大队）积极办合作农场。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我初次去郡王旗（现在的伊金霍洛旗）

见云北峯时，他一再告戒我装束要朴素。听了他的话我穿了旧棉衣白茬子皮裤去见得云北峯。李直哉和人们坐在一起经常肯用一些事实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宣传。促使了部分人包括我在内思想上的波动。虽然对自己的出路问题仍徘徊在十字路口，但初步理解了只有放下屠刀、安分守己、共产党是不会杀头的。

另外东胜与府谷相邻，府谷解放得早，本地人和那里的一些亲戚朋友往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基本上消除了种种疑虑。

基于上述，保安十六团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中内部分化日益加剧。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思想状况。一些人丢掉了高飞远走的幻想，认清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宁愿让共产党处置，也不愿走死无葬身之地的道路。另外也确实有那么些极个别的顽固分子，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固执己见准备顽抗到

底。绝大多数人脚登两支船，随风转舵。

一九四八年秋后，愈来愈多的人，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准备在共产党身上找出路，但一时机会难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当时东胜的城防任务，陈玉甲是不放心由十六团担负，城门岗哨由他派兵把守。十月间的一天，十六团的兵进城门没有下马，被他的哨兵打伤，由此而发生了争端，团部借机发动了城内官兵在大街小巷加设岗哨，凡遇到警备司令部的人不论官兵一齐动手去打，并派一个中队把司令部包围起来，门口架了两挺机枪，这一下把陈玉甲确实吓坏了，不但把城门上的岗哨全部撤掉，就连司令部的人也躲在室内闭门不出。保安十六团有些人有意要把事态扩大，以为可以逼上梁山！但谁都没有想到陈玉甲，感觉自己虚弱，在当天半夜率领全部人马从北墙穿洞逃走了。（他驻的营房西、北两座墙都是利用城墙来

做圍牆的)。团部在天亮后召开了中队长以上干部会，在会上对这件事作了细致的分析，一致认为这位堂堂乎司令受了这么大的冤气回到绥远后无疑要告十六团的状。他走后，保安十六团在精神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在很长时间，陈没有动静，深知他是自顾不得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郡王旗（现在的伊金霍洛旗）有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准格尔旗沙圪堵与共产党协商起义，在他们的行动影响之下，十六团的内部波动很大，经过李直哉的策划，终于说服了张继雄、杨文煥。他们和参议长李先唐一块儿去贾克让那里商谈，贾克让也表示同意前去沙圪堵联系，当下决定派张继雄，李直哉为代表，我也随同前去。贾克让说：“现在大年过在眼前，大家都回家去欢欢喜喜过上一个年，过了正月初十再动身也不晚”年后初八、九准备出发的人陆续来到县

城，而狡猾的贾克让又要了新的花招，他说：“这步路咱们一定要走，我认为现在时间还不成熟。傅先生（指傅作义）这个人在坚守卓子山，攻克百灵庙的事实，充分说明智勇双全，变化万千。这次在北平的投降是否出于真心，咱们很难肯定，如果他是假投降，这么一变咱们就会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我的看法还是不要冒险，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你们不要着急，哪有背上猪头找不到庙门的道理”。（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伙人马，投靠谁，谁还不欢迎吗？）把一些人说的三心二意，一时拿不定主意，准格尔之行没有实现。

四、最后的覆灭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后，国民党在东胜的机关走得一干二净。县衙门的人员也东逃西窜。身为团长的贾克让率领十余名武装警察躲藏在城北一带。一旦情况变化准备向包头逃窜，留

下这座破烂不堪的空城，由十六团团部带领一个大队防守。说老实话，整天起来提心吊胆，时刻准备当俘虏。

当年三月间解放军果然向东胜挺进，行军到达塔拉壕，派当地老乡给张继雄、杨文焕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韩是今、云北峯联名写的，信的内容主要交待了党的政策；指明了出路；最后要求立即有所表示。张继雄看了这封信以后，马上就让我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主要说明了我们这部分人是乱家百姓组合而成的，马上来做一个表示事实上不可能。限我们二十四小时以后再做具体答复。我把信写好以后张继雄进行了审阅，将信递到送信老乡手里，嘱咐他回去交给八路军。张继雄让传令兵告诉号兵发出紧急集合信号，待队集合齐立即撤出城外郝家圪卜。杨文焕大队就住在这里，张继雄和杨文焕见到面以后，随手把八路军的

信交给杨文焕，这位粗通文字、神气十足的家伙，板着一幅阴险的笑脸，边看边喊哈哈冷笑了一面，接着说：“八路军也知道有我这么一个杨文焕”。后来大家坐在一起等他把大烟抽足之后，由团部率领全团人马撤到巴彦门肯、什拉乌素即东胜西山一带。

解放军就在当天半夜一枪未放进入了东胜城内。这样彼此相距只不过十几华里左右，如果站在高处，城里来来往往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好象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谁也没有打算去袭击谁。就这样相持了三天以后，到第四天早晨，天刚亮张继雄就把我叫醒了，他说：

“你睡的多么美啊！我出去查了好几趟哨，连一次都没有把你惊醒，象你这样的人，真有当俘虏的可能”。我跟他开玩笑地说：“这条路迟早短不了走，早走迟走一样”。他接着说：

“别瞎说了，昨天晚上我心惶的连觉都睡不

着，是不是要出问题啦！你快一点把衣服穿好，咱们出去侦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于是俩人走出房间，东山头跑到西山头，最后走到一个小山头，半坡上有一座龙王庙，走进庙里塑像前放着占卜，（旧社会用来决定人们生活行动凶吉的一种迷信活动）当时俩人就打起卦来了，我一摇占卜上面写着“上上大吉”，他一摇不是“口愿不明”便是“凶多吉少”。他说：“你没有什么，我倒霉呀”！我说：“俩人走在一起哪有一个倒霉，一个不倒霉的道理”。话刚落音，勤务兵跑来说：“城里贾德义带着八路军的一封信让你们回去”。我俩走出庙门，回去先后都看了这封信。解放军还在催促表态问题，信中向我们指出现在几个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应该有所行动了吧！张继雄开口了：“我以为好几天过去了，他们可能忘记了，但这些老先生们还把表态问题记得这么牢。好

吧！咱们就照前两天俩人的打算办事。”他一边让我去见杨文焕商量；一边让贾得义静候消息。

我走了二华里多路，走进了杨文焕的房间。他让坐后，我见到杨文焕象一只死狗一样躺在炕上一股劲地抽大烟，杨康换（杨文焕的堂弟）一只脚蹬在炉台上，头倾下，一边给杨文焕熬大烟，一边满脸泪珠地哭过，此情此景，我一时难以识破，（事后才听说也是向他的哥哥杨文焕劝降，正在被哥哥责骂）杨文焕让我喝他的酥油炒米，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还不错，就乘机开了口：“八路军又来信让咱们表态，张副团长特派我来和你商量应该怎么办。”话没说完这个家伙脸色就变了，打断了我的话头向打机关枪似地说：“好吧！你是团部的人，下命令吧！你们说投降，咱们就投降，你们说交枪，咱们就交枪，我没有意见。”

我说：“杨大队长话不能这样讲，张副团长让我来和你商量，不是传达命令，你同意这么做或不同意那么做，决定权在于你，生这样的气干什么？”他瞪起眼皮又说：“其他大队呢？”我说：“其他大队表示听从团部的部署”。“那么好了我一个人算什么呢？”他很不平静地说。就在这个时刻，张继雄感觉我走得时间长了，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也跑来了。杨文焕不但没有让坐，而且连眼皮都没有眨。我也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张继雄自己坐在炉台墙上，用一张笑脸向杨文焕说：“你这个人抽坏呀！整天躺在炕上一股劲地抽”。（指杨不住气的抽大烟）杨一点也没有理会。象这样横眉冷眼的态度，从张继雄本人来说一生也很少遇过。他也生气了，叫了一声我，转身就往外走，我也随着出去了。他问我：“你说的结果怎样？”我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向他传达了

当时的情况，他赌气的说：“他妈的，你杨文焕舍起一条命，难道我姓张的舍不起吗？我是为了咱们几百人的生命着想……”。走回团部气得躺在炕上，不但没有给贾德义带回信，就连一个便条也没有写。贾怕回去无法交差，坐在炉台上不走。我怕张继雄在我的身上出火，无奈只好劝贾德义空手回去。在送他的路上，我简单的向介绍了一下内部情况，意思让他拿这点向八路军交差事好了。

未测杨文焕这个坏蛋就在当天找到贾克让，（贾住在西北方向，相距十余里）不但把团部的情况同时也把他弟弟杨康换的情况全部汇报了。因此贾克让就在当天晚上在靠近团部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他首先指出：“大家愿意靠拢共产党，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意见，但现在条件不成熟，我得到最可靠的情报，国民党的大批正

规军已到包头就在这两天要来东胜。你们都是守家在地的大户，如果咱们这样做了，这些部队来了，岂不是闯下灭顶之灾吗？千万不能冒险，等待这些队伍走了以后，咱们再随风转舵。这么一说，好多人认为团长才是心腹人，句句话很有道理。他接着又指出：“我还有个可靠的情报，就是驻在城里的八路军明天就要离开东胜向东撤退，我的意见咱们选拔百余名精兵，由张副团长指挥在拂晓时晨向城墙打上几枪，如果八路军走了，我们一方面可以向上邀功，不一定还能给我们补充一点枪弹，还能要一部电台。另一方面我们回到城里再吃那一斤半小米比较光彩”。经过他这么一说，大家一致认为收复东胜是件难事，向城墙打几枪，这还有什么难处。所以当场就决定了要干这椿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蠢事了。当时作了布置，定为鸡叫头遍准时在团部门前集合，临出

发时为了指挥灵活，动作一致，决定以鸣炮两声为信号，“鸣炮开枪，鸣炮收兵”，团部在城墙西北角。哪个大队在哪一方向都做了统一的布置。

天还未亮，这支少爷兵出发假攻东胜城，团部到达目的地后，鸣炮两声，随着各方面的步枪齐鸣。也有个别亡命之徒，擅自爬上城头自取丧命。大约半个小时后团部又鸣炮收了兵。这伙自以为得计，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到原地舒舒服服睡它一大觉。当时根本没有估计到解放军会追击，即便追击前防还有步兵防守。哪知这些步兵整整赌了一晚上钱，熬累了连哨兵都睡大觉了，保安十六团折腾了一晚上，激起解放军极大的愤怒，枪声一停立即动员战士在太阳刚露头，骑、步兵配合跟踪追来，一枪未放就把前哨步兵的枪枝全部缴获，顺利地通过了步兵的封锁线，闯入骑兵阵地。听到哨兵的枪

声，才发现解放军已漫山遍野到处皆是，未经应战，解放军就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把这伙亡命之徒打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在解放军紧追的袭击之下，这伙惊弓之鸟无处躲藏，路过李飞雄寨子时，杨文焕首先窜到寨子里。因为这个寨子是向西走的必经之途，所以他派他的大队副张仲臻站在寨子墙上，手持一支步枪向逃命的官兵威胁说：“都进寨子，谁敢跑，我一枪就打死谁”。在他的威胁之下，百余名骑兵乖乖地都进入这个破寨里，准备背水一战。但解放军的左右翼部队，逐步靠拢很快就从寨子四面紧紧地包围起来。寨子门前有个高土丘，解放军就在这个土丘上面架了两挺机枪。这样寨子里不用说人马行动了。就连一个麻雀也飞不出去。保安十六团已成瓮中之鳖。从枪声开始计算起仅仅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解放军猛烈进攻下，终于举起了白旗。

绥远建设厅长冯曦氏建筑东胜县城记

录自：民国《边疆调整报告书之三》

绥远建设事业，千端万绪，议者莫不以开发地方，殖民实边为第一要议；然有一地方之开发，必须以保障之严，重心之寄，俾其生聚教育，日益推进，始能于开辟之后，继之以发展；故筑城建署，在内地无复可议，在绥远则尤为现政之亟亟者也。绥远西南伊克昭盟扎萨克郡王两旗游牧所在，为汉之西河旧地。唐设东胜州，辽时复置。明筑东胜城，后被淹没。清季绥垦创办，郡王旗首先报输，扎旗继之，东至准格尔，西至乌审鄂托克，南至牌界，北至杭锦达拉特，自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共放地一万八百顷。其势迤邐活鸡图河而上，自康熙迄光绪迭次展界，俗称新旧牌子地。当垦

政未举时，人民诉讼案件，南赴陕之神木榆林，北赴晋之萨拉齐厅，贻将军毅督办垦务，始以该处草莱初辟，寄民约七八千家，未便使其无所归宿，爰凝板素壕地方，背负黄河，西邻大召，为郡扎两旗平衍之区，于光绪三十三年增设理事通判一员，奏请就便裁撤山西磴口通判刺，以原有薪俸，为设治之经费，因其地为前明东胜城，即名曰东胜厅，旋以垦界划疆，又移驻羊场壕。民国元年，改厅为县。二年，晋绥分治，属绥直辖。而政变以来，匪患时闻，地方荒凉，保卫困难，历任知事，大都侨居距县二百里外之包头而遥治之。虽原有民户，已达七八千家，而现在村仅六。余则散居沙崖土穴间，状如晨星，到处皆家村也。萑苻遍野，既无城堡以资依障。土质瘠薄，旱灾迭见，复远官厅，不便抚辑。以今视昔，地荒十之六，民亡十之五，不唯政治难以进展，即原状亦无由

恢复。查全县面积即有十四万二千八百方里，升科之地，总计一万一千三百余顷，户口仍有四千四百余家，再沿从前放任办法，听其自生自灭，又何贵乎设治曾多言开发耶。故于十七年商之前省府主席李公涵函，飭县长移居县境，始由陶油房设办公处。是年荒旱成灾，居民更多流离，复建议省赈务会，将分配该县工赈款六千元，筑方里之城，以工代赈。又以县政府亟待兴修，呈请省政府先在垦务征存建筑费项下，提拔一万二千元，建设县署一，公安局一，司法公所一，以谋久远；均经规定方式，今县遵办，并仍在羊场壕地方驻扎，从人民之请也。司以款不敷用，地方人民无力负担，复呈请由省库补助三千元，由垦务征存建筑费项下贷借三千元，以竟全功，于十九年七月，由县长王文泉在陶油房召集地方人士，设董事会，筹维建设，于二十年十月方克告成。

虽督促指导，固属应尽之责，而惨淡经营，将及两年皆县长王文泉及地方人士之力也。从此河西人民，有所依障，政治重心，亦臻稳固。他日繁荣，得与绥远各县同时并进，不独开发主旨，始终贯彻，将见西北旷土，创建经营，未尝不以东胜为嚆矢，爰就经过情形，作将来参酌，故勒不而为之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东胜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6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